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01

2000年第3期

第27卷 第3期

總第201期

2000.7.15

每冊港幣15元

「六四」週年看中國社會抗爭



陳水扁就職後的兩岸關係 歐盟邁向霸權

成立三年的香港特區政府 「訊息時代」？

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第一時期的終結

成立三年的 香港特區政府

振言

日增的民間反對行動

香港特區成立3年，政府的施政失誤越來越多，加劇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分化，民間怨憤日增，上街遊行示威請願行動頻密，反映了港人普遍而強烈的不滿。單在6月25日，便有5宗遊行示威或靜坐抗議的行動，參加人數合共近7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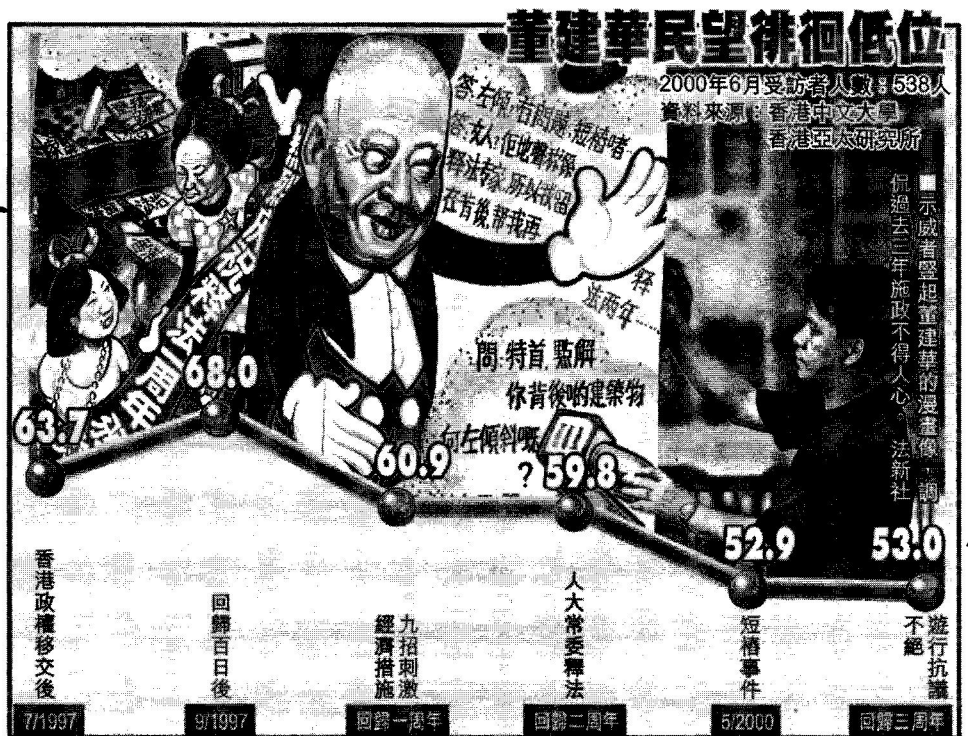
這5宗行動，來自社會不同的階級階層，分別表達了對政府有關政策的強烈不滿：

一是社會最底層的舊區居民，他們抗議即將成立的市區重建局可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一口價」收地，使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合理補償，是當局欺壓貧苦弱勢社群的事例之一；

二是反對政府一筆過撥款的社工界「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他們明瞭這項新措施將會使福利機構緊縮開支，裁員減薪，福利工作遭受不良影響；

三是專上學生聯會和爭取居港權的人士遊行至政府總部集會，向港府請願，並悼念人大解釋基本法一週年；

四是政府的現職醫生，他們舉行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醫生靜坐行動，以表達對醫管局實施醫生二級制的不滿，這個制度在現時醫生人手不足下，只會令門診及手術輪候時間拖長，最終令市民受害；



五是自由黨發起的苦業主大遊行，他們申訴自己買下的物業價跌了一半，許多小業主因此負債，要求政府改變房屋政策，使樓價回升。（但在此應該指出，要求使樓價回升以至將來劇漲，是不利於絕大多數市民，尤其是低下層市民的。）

在這之前不久，已舉行過多次示威遊行，例如6千教師的遊行請願，要求當局撤銷語文基準試的決定。接踵而來的，7月1日還有回歸3週年時的港九工團3日絕食行動、學聯和幾十個民間組織的抗議大遊行、爭取撤銷語文準基試的教師再遊行，及爭取基本生活保障勞工權益組織與多個民間團體的集會，抗議政府施政混亂；稍後還有17個公務員工會舉行「全港公務員保衛權益七九大遊行」，反對公務員改革方案，據預計有幾萬公務員參加。

從99年6月至今這1年內，警方宣稱已有654次遊行和649次集會，平均每日幾乎各有兩次。

民憤加劇的根因

這種市民頻密上街抗議情況，即使在港英殖民地統治時代，也是很少見的。其根本原因，是特區政府的政策要盡力維護有錢人的權益，幫助他們大賺財

富，同時為政府本身多方搜刮，優待高官，大積盈餘；但低下層市民的權益則得不到保障（例如，政府一直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制和最長工時制），收入普遍減少，生活日見艱難，分享不到香港繁榮進步所帶來的成果。當政府統計結果顯示99年的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已達到12,322億元（港元，以下同），按人口平均的生產總值達到18萬元的時候，全港月入4千元以下的家庭數，卻由97年的8.8萬個，增至現時的17.8萬個，特區成立3年就增加了1倍多；而月入4,600元的家庭則有40萬個（6月24日《蘋果日報》報道羅致光和李啓明先後對特首的質疑）。政府統計香港家庭平均入息的中位數是17,400元。公認的貧窮線是中位數的一半，即8,700元，但全港家庭將近兩成的貧窮家庭收入卻幾乎只到這個貧窮線的一半。請試想想，平均約3.3個人的家庭，靠這樣微小的收入怎樣度日？但在社會的另一極，特區政府繼承港英的政策，大大幫助了資產階級，特別是大地產集團，使他們的財富快速增長，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到7百萬人口，去年卻有4人名列世界百名巨富之內，這4人與其他9港人的財富合計共1萬多億元。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因地產樓價不斷劇增而暴富的。尤其是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其股價市值從73年的1.3億元，暴升至88年的175億元，99年更升到1,969億元，其本人的財產則達到881億元。新鴻基地產的股值，也從73年的4億元，飆升到今年中期的1,391億元。長期以來，港府推行的三高（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政策，把港人創造出來的財富大量地流進一小撮大地產商的口袋裡；特首、黃星華等高官還充當後者的推銷員，多次勸市民買樓。樓價被瘋狂炒高而猛跌5成，致令許多小業主慘遭損失，就是政府上述政策的惡果之一。在地產商（還有中銀集團）要求政府採措施迫使樓價重升之後，當局宣佈暫時停售居屋，這是開始托市的一步，使中下層市民失去選擇的機會，而迫得要買私樓；以後還會有托高樓價的措施出台，從而使地產商獲利，而一般市民則要繼續捱高樓價、高租值之苦。

在特區成立前後，我們曾多次指出，特區政府是官商勾結的專政，要盡力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立3年來，它這個本質和路線毫無改變。除了上述對大地產集團、大財團的偏幫外，最近批准兩間壟斷的電

力公司不必要地大增固定資產設備以取得增加電費的藉口，又一次表現它維護資本家而損害市民利益的本質。

這也就是特區政府聲望最近滑落至低位的主要原因。據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的最新調查結果，不滿意港府表現的被訪者，從99年6月的46%，上升到今年6月的53%，滿意的則從25.6%下跌到10.6%（6月28日《蘋果日報》）。相信類似的民調結果會繼續出現。

反對打壓，爭取民主自由

在自己政策造成這樣的惡劣情勢之下，港府照理應該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順應普遍的民意，徹底改正錯誤，以紓解民間的怨憤。但6月26日的表現，卻是反上述的正道而行。逾百名奉著命令的警員，對約20名的學聯和爭取居留權人士的和平靜坐示威動用武力，驅趕他們；在他們撤離時，警員仍追著他們當面發射胡椒噴霧，致使多人眼睛受傷，健康長期受到傷害；有的警員在一位受傷者背後拳打其後腦；學聯代表、中大學生會會長馮繼遠被噴霧射眼，「失明」了10多分鐘；一位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陳敬慈申訴在給警察抬起後擲到地上，復遭人在胸前狠狠踩了一腳。他多處受傷，後來連同其餘10位受傷請願人士送院醫治。據傳媒報道，警方行動是有目標對象的。警員當時的粗暴行動，被眾多記者攝入鏡頭，連事實報道一起刊載於27日的報章上，許多報章評論都嚴詞指責警方的無理打壓。這樣的鐵拳高壓，不但不能壓服民間普遍的不滿和抗爭行動，反而會火上加油，使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這樣的用武力壓制小批人的和平集會請願，更是剝奪市民所應有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是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所明文保障著的。

26日的粗暴行動，也將傳至世界各地，使各國人民從媒體電視上看到香港特區的這種醜態，會認為是對特首誇言將使香港成為紐約、倫敦的最大諷刺！

以上對特區政府的評論可以又一次證明：必須徹底改革政制，經由全港市民普選行政長官及重要官員，且可隨時加以撤換，實行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才有可能改正香港現存的不合理、不民主、高官不重視民意、不關心民間疾苦、不稱職等嚴重缺點、錯誤。

2000年6月28日

終身進修！撤銷語文基準試！

微波

香港在回歸後，特區政府3年來的政策措施，日益加劇中下層市民的不滿、反對，上街遊行的次數日增。教師反對語文基準試是一個新例，顯示官僚領導人的有關錯誤政策，是如何增加民怨民憤、導致香港社會的矛盾衝突尖銳化的。

教育統籌局在98年10月的《施政方針》中規定，到2005年，全港所有語文教師都要達到語文基準，否則不能再教語文科；到2008年，其他所有教師都要達到基準。今年4月，當局宣佈語文教師都須接受語文基準試，不及格的即不能教語文科。其主要理由是香港學生的語文水準低落，需要通過對全港教師的基準試，提高教師的質素，從而提高學生的語文水準。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刀切的做法，是非常專橫有害的。

當教師們分別收到當局的通告須考這個試之後，深感不滿，認為當局把學生語文水準低落的責任全歸在教師肩上，把香港教育制度的嚴重缺失歸咎於教師，是非常不公道，也不合事實的。他們幾乎都在大專院校修讀完英語科，或者經過不斷進修，已取得專業資格；現在當局又要重考，等於否定他們過去的資歷，連《基本法》第142條也加以違反。官員及其支持者，又出言侮辱，傷害教師尊嚴，破壞專業形象，影響社會互信……。

他們紛紛向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投訴，要求教協代表教師會員與當局交涉，取消這項考試。教協經過徵詢會員意見，得到了37,000位教師（佔全港中、小學教師8成）的簽名反對；並且決定，如當局最後仍堅持要考這個試，則他們就罷考。

教統局局長王永平堅決拒絕取消語文基準試，得助於與教協另立門戶的教育工作者聯會聯合其他6個教育團體的支持，它們表示反對教師們以罷考搞對抗，認為教師應以「身教」教導學生正視問題。在不少輿論被發動之下，部份市民也對教協及教師產生了誤解，誤以為教師不思進取，害怕考試。官僚們使用中國文革式的手法，推動群眾鬥群眾。

官僚們這些做法更加劇了教師們的反感，在6月11日遊行請願，有6千教師參加，他們情緒激昂，表現得更為團結。他們提出「團結一致，榮辱與共」，「終身進修，超越基準」的口號。

教師這次行動的發起人之一韓連山認為，罷考與教師尊嚴無關；「施暴者說自己無施暴，踐踏人尊嚴又叫人放下尊嚴！」

支持基準試的教師是非常少的。這從教育評議會6月初向400間中學和60間小學的英語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可以得到證明：在505份已收回問卷中，分別只有6.2%和4.8%的中、小學教師回答願意透過基準試達標（見6月7日《明報》）。由此也反映基準試不受教師歡迎的程度。在當局這項措施遭到普遍反對後，王永平改而提出部份教師可以豁免；後來又宣佈，原定今年10月的全部現職語文教師基準試，暫可豁免，只有新入職語文教師才需應考，在1年內通過基準試。他企圖以此分化反對力量，同時作緩兵之計，暫時緩和廣大教師的憤慨情緒。但這樣一來又弄巧反拙，點起另一個反對火頭。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不滿這個安排，並為大專院校及新入職語文教師抱不平。他質問：「何以要（當教師的）畢業生考基準試？即是說大學教得不好？中大不覺得中大畢業生語文水平太差，……對他們沒信心，就不應該給他們畢業！」中大教育系畢業生在校內張貼橫額，抗議新入職教師未能與現職教師享同等待遇。

由王永平代表的教育當局，仍然堅決拒絕取消基準試。這迫使教師們只有準備罷考來爭取達到取消它的目的。這完全是當局的無理舉措和死硬態度所造成的。

但是，替當局保駕護航的教聯會，其副會長黃均瑜卻公開指責教協和教師發起罷考的做法，說「教師是專業人士，工會有工會的做法，教師不應以工會方式搞對抗。」（5月26日《明報》）這是公然反對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規定的人人有罷工等自由，以及《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公民有罷工等權利和自由。教

師是腦力勞動者，正如其他許多行業的專業人士一樣，有組織及參加工會和罷工（罷考也應是其中一種）的權利和自由。教協也具備工會的性質，有義務和權力去捍衛自己會員的權益，並以各種方法去反對所有侵犯會員權益的官方措施，有如世界各國的教師工會領導無數次教師罷工等行動一樣。當然，官方御用的工會不斷地出賣會員的權益，專為統治者服務，並不是工人自己的工會，終會遭到工人會員的唾棄，而另組新的工會。教聯會負責人公然反對教師進行抗爭行動，反映出他們並不以教育工作者權益為重，而是以支持政府施政為己任。人們只想要人民逆來順受，做擁護政府的馴服羔羊！

對於政府的錯誤措施，即使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也作出了批評：「政府推出政策時未夠周詳，進行細節仍未準備就緒」。但當局卻急不及待地要所有語文教師參加今年10月的語文基準試；在遭到反對後又一再改變手法，從一個錯誤走到另一個錯誤。

除了上述的重大錯誤外，在教統局局長王永平任內的其他苛政還有：

1. 要大專學費與成本掛鉤，在近年開始了收回成本18%的政策。最近被發現在98至99學年，因通縮而變相超收了學費9300多萬元，教統局雖發聲明否認，卻主動提到98至01年3個學年，逐步將培訓1名學生平均單位成本減少10%，而學費則凍結。

2. 建議01至02年實施按課程類別和程度收取不同學費的制度。這個大專分科收費計劃，激發起大專學生的激烈反對和示威，兩度企圖衝入政府總部，要與王永平對話。結果王永平被迫宣佈在現階段不考慮推行。

3. 學校改善工程突然叫停，令亟待改善環境的學校非常憤怒。但他最近為了阻止教師們參加大遊行，卻浪費公帑1百多萬元，用特快專遞分別致函44,000教師。

4. 兩年內提供250名資訊科技統籌員，由全港學校爭奪，教育界指責當局以此製造學校間的不公平。

5. 擬撤銷政府對法律文憑課程的資助，大律師公會和律政司都予以反對。

像這樣無能而又錯誤迭出、形象惡劣的高官，港府高層仍然繼續重用他，正如對領導無能、產生連串大醜聞的房委會和房屋署的頭頭極力維護一樣。由此

可見港府這個官僚架構的官官相衛、臃腫而又無能，必須加以徹底的民主改革，由全港市民普選特首和重要官員，並隨時可予撤職；同時不要當局那些損害絕大多數港人權益的「改革」。

我們贊同教協會向政府提出的4項要求：1、撤銷語文基準試，老師以終身學習去超越基準；2、政府提交全方位的教師語文訓練方案；3、減少學校每班學生人數，減低教師工作量；4、政府就以往一些傷害教師的言論道歉。

2000年6月20日



●一批中五學生也參與請願，支持老師

「反基準打油詩」（轉載）

亞湯

「怎料教署把我嫌 教育漏洞叫我填 從來決策我沒權
拿我開刀亦枉然 基準試踐踏尊嚴 重新考牌是食言
教育政策添混亂 搖首歎息淚綿綿 老師怒火心裏燃
不甘屈辱要周旋 多年謙忍難再存 怒吼之聲要相傳」

支持民運人士梁國雄 公民抗命無罪！ 侵犯公民自由可恥！

五月二十六日，民運人士梁國雄因擾亂立法會會議被判處監禁十四日，反映香港的民主自由備受壓制。這是香港回歸以後因政治理由被監禁的首個判案。事實上，當日梁氏是以和平請願的方式，於立法會內直接向董建華表達有關政府干預股市，不顧基層勞工失業的苦楚。可以說，梁國雄何罪之有？

更重要的，一日立法會沒有全面的民主，市民的聲音均無法於建制內得到反映，類似的公民抗命將無日無之。

對於梁國雄多年來為本港的民主及基層運動作出犧牲，努力及貢獻，我們表示敬佩和支持。我們更強烈抗議董建華政府扼殺港人言論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聯署團體及個人：

反對政治迫害委員會

反失業反貧窮聯盟

四五行動

前綫

先驅社

中國之春

全民制憲學會

香港民主之聲

香港大學學生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

街坊工友服務處

香港基督徒學會

中國自由民主黨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范國威議員辦事處

中國民主黨聯合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十月評論社

陳昌區議員辦事處

司徒華

林森成

黎麗霞

蔡耀昌

劉山青

陳國樑

徐百弟

陳偉業

陶君行

曾健成

鄺國全

趙葭甫

黃仲棋

鍾祖康

馮智活

莫佩嫻

羅照輝

伍國雄

思源

陸嘉名

馬健偉

李少玲

陳澤釗

葉景輝

陳妙德

李勁堯

林藹雲

黃活華

呂家攻

劉榮輝

楊少群

劉千石

鄭雅詩

陳家偉

石炳坤

王英瑜

宋治德

張麗霞

葉沛瑜

施鵬翔

譚駿賢

鄧燕娥

麥德正

蕭順意

陳敬慈

黎梅貞

萬寶

成偉邦

古南

高寶玲

張逸峰

黃廷俊

王寧來

林儀志

司徒振邦

葉家聯

馮家強

黃曉莊

蕭裕均

鄭駿唯

盧偉明

張韻琪

鄭家富

古思堯

雷玉蓮

馮健輝

鄧徐中

朱耀忠

呂志文

加菲

許勝利

古桂耀

艾禮德

陳惠芳

柯華

李鳳凰

車宛諭

黃於唱

李偉文

馬惠茹

黃鳳珠

李小龍

林咏然

何長輝

陳多偉

馬楚明

王承文

王瑞瑩

袁凱欣

吳曦然

謝世恒

梁柏能

梁耀忠

唐婉清

吳恭劭

鄭其健

羅就

徐漢光

陳洪

陳漢森

梁根源

潘天賜

潘瑩明

黎紹珍

陳寶瑩

劉子濂

馮競文

陳清華

楊鵬展

張銳輝

張允提

林文宗

梁家成

陳慧敏

鄧敬來

饒戈

錢惠玲

李念先

Kelly

Y.T. Wong

周國強

(Zhou Guoqiang)

陳水扁就職後的兩岸關係

軍行

就職演辭的表態

陳水扁的總統就職演說，相當遷就北京的重大壓力，表示出尋求和解的善意，暫時沒有刺激起中南海領導層的強烈反應，使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兩岸關係不致急劇升級。而在台灣人民方面，也沒有認為他已喪失原有的基本立場。

陳水扁指出：「台灣在半個世紀以來，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也締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跡。」他多次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宣示未來施政的方向是要把《國際人權法典》國內法化。（這種民主的發展，在台灣民眾心目中是很感自豪的，尤其是對比於彼岸的話。）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是：清流共治，掃除黑金，杜絕賄選。

對於兩岸關係，他比以前作出了一點讓步，宣稱「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與創意，秉持民主的原則，……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他以此間接地回應了「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

他保證，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則在他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而原來的國家統一綱領的要點之一是：「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承諾不廢除國統綱領，亦即意味仍然承認這個綱領的內容。

在陳水扁演說後的當日，台灣東森電視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83%受訪者滿意他的就職演說，兩岸關係部份也獲近7成人肯定（5月21日《蘋果日報》報道）。稍後的行政院陸委會的民意調查顯示，近9成民眾贊成他對兩岸關係的「5不主張」，83%認為就職演說對大陸表達了善意，並認為大陸亦應對台有善意回應。另有87%同意「兩岸的平等地位要先確立，才能有助於台灣政府與大陸方面進行談判」；83%不贊成大陸以「一國兩制」發展兩岸關係的主張。（5月26日《東方日報》報道）

在就職近一個月時候，台灣地區公共事務學會的電話訪問結果，依然有77.1%對他的施政表現表示滿意，不滿意的不到一成。這些相信都大抵上可反映台灣多數的民意趨向，顯示出陳水扁在台灣民眾中是受擁戴的。

北京的堅持

可是，北京的迅速反應卻截然不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表聲明，開頭引述陳演說中提到的「五不」，意味它對這部份的肯定。但卻指責就職演辭對「一個中國」原則採取了迴避、模糊的態度，認為「他的『善意和解』是缺乏誠意的」，並且對陳水扁把一個中國說成是「未來的」表示不滿。不過，聲明表示：「我們繼續大力發展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以『一個中國、兩岸談判』的方式推動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當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台灣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台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後一說法與不久前北京方面否定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強硬態度已有所不同。

北京堅稱92年達成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是有文字記錄的。但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則說：雙方當時曾各提5個方案，後來海協會在電話中同意在口頭上各自表述。海協會有意以書面表述會談的結果，海基會沒有回覆，僅去函海協會表述台灣的「一個中國」在國統綱領中已有表述（見4月30日《明報》的《神州脈搏》秦勝的引述）。對於「一個中國」的問題，直到最近，海基會董事長、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還說：「大家對『一個中國』的概念都不清楚，他認為，『一個中國』是一個大的中國，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要統一，那個統一的國家將來當然是台灣以及包括中國大陸。」（6月18日《文匯報》）

由於現時海基會對先須同意一個中國原則這個先決條件未加以接受，使兩會商談繼續停頓。北京對台

工作的官員重申：在海基會未對一個中國原則作出明確認同的表態之前，海協會不會與之接觸。海協會對於海基會的來函沒有回覆。北京將希望寄託於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黨派和團體，進行對話、協商（6月10日《文匯報》）。但現時在台灣，對北京政權友好、認同、贊成盡快統一的黨派和團體的力量並不大，不獲台灣當局所授權；如要依靠它們取代海基會來解決困難及問題，至少也是捨近圖遠的做法。

何以兩岸不能用朝韓會談模式？

兩個月之前，當朝韓宣佈兩國首腦將舉行會談以後，筆者在《台灣大選面面觀》一文（刊本刊上期）中曾指出，這對韓朝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而對海峽兩岸領導人和人民也應該是很適時的啓示。兩岸許多人民都會問：既然朝鮮南北雙方能夠不設定會談的先決條件而進行會談，為什麼兩岸雙方卻不能呢？

嗣後，朝韓首腦會談已經成功地達致多項協議。中國外交部為此發表聲明，認為這「是具有歷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相信這將對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寶貴貢獻。」「中方一貫主張朝鮮半島統一問題應由當事雙方通過對話協商加以解決。希望雙方繼續本著和解與合作的精神……為最終實現半島的自主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

上述的貢獻、主張、希望，其實也完全應該適用於海峽兩岸的會談，通過協商解決兩岸的歧見，以期最終達致統一。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聲言：「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在產生的原因和性質上不同於德國問題或朝鮮問題，因此不能相提並論」；北京「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的方式來處理台灣問題。」這也就是說，不能用毋須先接受對方的前提條件便進行會談的模式。

現在，讓我們看看他所代表而提出的「理由」是否合理吧：

一是說產生的原因不同。東德、北朝鮮和新中國當年產生的情況雖不完全相同，但她們都是由於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代表不同階級的兩種力量激烈鬥爭、通過戰爭從原來的國家領土上宣佈成立新的國家政權，與舊的統治階級政權繼續對立、抗衡的。台灣在抗戰結束後由國民黨從日帝的長期侵佔下「接收」過來，國民黨隨著內戰失敗而退出大陸後，便全力加強其在台的統治。國民黨以中華民國國號統治台灣已有50多年，由兩個不同國號的政府分治著兩岸，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因此，朝鮮、兩德和兩岸基本上都是戰

爭或「內戰遺留的問題」。這樣的新國家產生原因，或者，即使「純屬中國的內政」，又怎能構成截然不同的解決模式，使兩岸的高層不能面對面會談？

二是說政治性質不同，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絕大多數國家都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而同時承認朝韓是兩個主權國家，因此不能像朝韓一樣經由高層會談解決問題。但是，今天還有少部份國家仍繼續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與台灣政府維持著外交關係。如果以承認中國的邦交國家多少來決定解決問題的方式，則在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期間，有許多國家還未承認北京政權，而只在後來才陸續改變立場，接受北京的建交條件，只承認北京政權而與台灣政府斷絕正式外交關係（美國便是經過20多年之後，在70年代才作此轉變的），但她們與後者仍保持著非官方的「民間」關係。當新中國還未得到大多數國家普遍承認的時候，是否就應該用與今天不同的解決方法呢？而且，朝鮮問題即使是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為兩個國家的問題，今天也是由朝韓兩國首腦會談來開始解決，而不是靠國際社會干預、解決的。可見這不是決定問題的關鍵準則和「理由」。

拿出這樣不成理由的「理由」去反對兩岸會談，而一定要台方先接受北京的前提條件，即先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她的一部份，才能舉行，那就會被台灣人民視為無理拒絕會談的藉口。北京這樣的「理由」，不但極難為台灣人民接受，反而會引起後者更多的反感，在對照朝韓峰會的成功事例之後，會又一次認為中共領導層蠻不講理，只要用高壓手法企圖強迫台灣人民完全屈服，以大壓小，以強凌弱。

台灣人民覺得自己長期爭取到的民主自由權利，是非常寶貴的，他們已在嚐到「主權在民」的好處；如果大陸仍然沒有民主自由，他們自然不會願意被強迫統一，接受官僚專制的統治（即使是暫時的間接的統治）。縱令中共將來不惜付出非常重大的代價，以武力進佔了台灣，那也是不得台灣民心，勢必遭到長期的抵制、反抗的。唯有在大陸進行了民主政治改革，同時充份尊重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通過兩岸領導層耐心的對話協商和人民的同意，最後達致全中國的民主和平統一，這樣才能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合理而有效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2000年6月19日

「六四」十一週年看中國社會的抗爭

張開

民運火炬在傳送

儘管「六四」已過去了11年，儘管中國當局繼續在打壓不同政見人士，但是，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反對專制迫害的抗爭，依然在中國國內和國外持續進行。

受害深重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共100多個家庭，聯同多個關注人權的組織，開始一項「天安門母親」的爭取公義運動，她們加入阿根廷、智利及南韓光州事件等難屬的行動，從事名為END OF IMPURITY（終止不公義）的行動，要求政府停止摧殘人民。這意味她們已抹去眼淚，與國際人士團結起來繼續鬥爭。

同時，六四死難者家屬今年再次致江澤民、朱鎔基公開信，重提要求調查「六四」，並作出解釋及賠償死傷者，等等。

吉林省8名異議者和著名民運人士劉曉波等人，分別發出公開信，繼續要求平反六四，釋放在押異議人士，給六四死難者以人道賠償，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制。

在四川、重慶、河南、河北等地，以及在美國華盛頓的民運人士，國內外各有幾十人絕食24小時，以悼念六四的死難者。在6月4日，已知全國至少有15人因試圖悼念六四而被捕，包括兩位在北大點燃蠟燭追悼的大學生。

在官方非常嚴密戒備的天安門廣場，不畏拘禁的中國民主黨支持者沈志道，繼去年同日同地打開寫著「民主、人權」等標語的太陽傘而被拘捕，今年又顯示寫著「推翻暴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襯衣而再被捕。

人民利用互聯網悼念六四，使得中國統治者下令嚴加監控，連一些隱晦的訊息也要予以封殺，不許網吧讓客人瀏覽；但這並不能根本阻遏異議者的聲音，它的黑手更不能伸蓋得住海外的網站，阻不了「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徵集全球簽名。廣大網友仍可在大陸瀏覽到海外上網的民運等資訊。

在香港，有2,000人參加大遊行、45,000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今年的集會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要「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近30名小朋友上台接過民主火炬，高聲朗讀民主宣言。大會播出了「天安門母親」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給香港同胞的信，

和香港記者突破北京官方封鎖而訪問了丁子霖的錄音，她表示感謝香港市民11年來對「六四」受害者的聲援，更希望大家堅持信念，「為死者討回人間的公道，為生者爭取做人的尊嚴。」

在台灣台北市，舉行了11年來規模最大的跨黨派「六四」燭光集會。澳門的集會則有數百人參加。

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也有許多人舉行六四集會。而據悉，在美國多個城市（哈佛市、紐約、華盛頓、三藩市等），出席人數比10週年時更多。

儘管香港等地今年悼念六四的參加人數比去年10週年時減少，但這並不表示沒有參加的人都已遺忘了、不支持民運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已經寫入史冊，不可能塗抹掉。而所有上述的悼念活動，則明確地向社會、向人民（包括新生一代）傳遞一個訊息：必須繼續努力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這支火炬是不會熄滅的。這也是與大陸人民日增的示威抗爭行動相呼應，向官僚層繼續施壓挑戰，不斷威脅其統治地位。

社會抗爭繼續增高

怨憤和要求伸張正義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雖然人數不多，表面看似力量微小而孤立，其實卻代表了、反映了廣大民眾對當局鎮壓民運的不滿和訴求；這些已構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眾多不滿的一部份，各種不滿來自一般民眾、工人、農民等各方面，不滿的反對的對象都是各級的統治者，他們的官僚主義專橫行為、損害人民利益的錯誤政策措施、貪污舞弊、人民百姓受苦而他們卻生活奢侈腐化……。所有這些錯誤正是釀成八九民運爆發的原因。學生、工人、民眾們要求肅清貪污腐化，實行民主政制改革，這些訴求是中國迫切需要予以實現的，但卻遭到中共的死硬領導層所拒絕（包括拒與學生對話），而且出動軍隊對付，使八九民運被殘酷鎮壓了下去。可是，當時所提出要反對的貪污腐化、官倒、官僚專制，後來卻發展得更加嚴重。隨著中國的日益資本主義化，無數大小官僚幹部的私人財富也日益增加，許多幹部更是資產階級化。由此從反面證明了八九民運訴求的正確性和重要性。

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官僚政制所造成的社會分化日增，貧富懸殊擴大，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因而爆發

更多的抗議、鬥爭。這從以下的具體數字可顯示出來：

（一）大陸民眾以上街遊行示威方式表達不滿的數字日益增加。據官方內部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全國各地至少發生10萬宗示威遊行，平均每日就有270宗，比前年有關數字多出7成。日前北京及瀋陽均相繼有民眾因民生問題上街示威，以阻塞交通的方式向當局表達不滿。（6月12日《蘋果日報》綜合報道）

（二）1999年中國勞動糾紛達到12萬件，是1992年的8,150件的14倍。去年比諸1998年，則增加了29%。至於集體勞動糾紛（包括遊行、示威等），1998年達到6,567件，有251,268工人參加，是1993年的9倍。在北京，1999年上半年的勞動糾紛是1998年同期的兩倍，而集體糾紛則是98年的4倍。（2000年4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報道，轉引自《先驅》季刊第56期）

（三）1998年共有216,750次罷工，共計350萬工人參加，有627次是直接攻擊黨政機構，有459次發生同警方的暴力衝突。（香港《中國勞工通訊》1999年3-4月號，轉引自《先驅》季刊第56期）

上引的第1項數字包括了城鄉居民由於不滿生活上的問題而產生；他們面對生活水平降低而且困難，使多年來積累著的不滿，不再像以前那樣「敢怒不敢言」，而是遇到一些即使是較小的事（如暫停供水或無電力幾天），也上街頭靜坐或遊行，以阻塞交通，引起社會注意，迫使當局解決問題。因而在許多城市，近年來掀起了一種示威風，越來越旺烈。在農村，農民權益大受損害，捐稅攤派沉重，生活難以改善，成為抗爭加劇的主因。

第2、3項數字是工人方面的。這些數字巨大，而且逐年大增，是由於下述一種甚至幾種原因所激發成：1.企業拖欠工資；2.不滿福利待遇、工作條件或安全衛生惡劣；3.工人權益被侵奪；4.下崗或離退休後卻得不到合理補償；5.國企被賤賣，令領導人中飽私囊，而工人則失業且很少補償；6.國企推行結構重整或私有化而裁減職工；7.對幹部的貪污腐化和專橫行為非常反感；等等。

抗爭的根源

工人階級和城鄉民眾抗爭頻密的重要根源，是中共的官僚專政，又日益推行走向資本主義、有損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各種改革，包括國有企業、體制、住房、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等改革。《中國改革報》今年2月29日刊出蘇北寫的《世紀之交國企職工心態》一文，在報道了「國企廣大職工」對上述各種改革不利於工人的具體缺點之後，跟著指出「還有教育改革、

物價改革、人事改革等，改來改去，似乎都在職工身上打主意。因此，有少數職工說：『改革越深化，職工越害怕。』」儘管作者編者們可能顧慮到黨官的反應而用詞較溫和，但廣大職工「擔心改革」，不滿各種改革對職工權益的侵奪，則已躍然紙上。

上述的各種改革，不但是對全體工人，而且許多都牽涉到其他階層民眾的權益，與人人都有利害關係。同時，工人和城鄉居民的抗爭行動，又互相影響、激勵、促進，從而引發更多的鬥爭。當局在自己錯誤政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激化面前，再也不能——用鐵腕高壓把動盪或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多年前官方常說的「豪語」），而要被迫加以容忍，甚至讓步了——雖然有時也必須出動軍警予以鎮壓，例如今年2月對遼寧省2萬多礦工佔據街道3天、阻塞鐵路和燒車的武力鎮壓。

北大學生的一次勝利

受到眾多社會鬥爭的感應，北京大學學生也以舉行追悼會為導火線，在六四之前10多天爆發了鬥爭。由於北大女生邱慶楓在從分校返正校途中被殺害，校方起初鑒於迫近六四，安定第一，將此事定性為「校外發生的普通刑事案件」，且不許學生戴白花哀悼，禁止在校內舉行追悼活動。由此激起學生們異常的憤慨，在平日積累著的不滿之火上加油，他們指責校方寧可花錢裝修辦公室等，卻長期漠視校區的安全問題（包括不安裝路燈等），對這次邱慶楓被害應負有一定的責任。2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並遊行抗議，大部份學生更企圖衝出校門上街遊行，這才迫使校方和政府讓步，容許在校內舉辦追悼會，有6千人參加，清華等校學生也來悼念。這次的鬥爭勝利，將會重燃他們的傳統鬥志。跟著在校內貼上要求平反六四的大小字報，和在六四晚上燃點蠟燭悼念，便是一些已見的跡象。

統治者十分明白民間怨憤不滿的嚴重化，懼怕「不穩定因素」的普遍表面化，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於是企圖先發制人，把法輪功封殺，繼而又取締中功及一切氣功團體，不許人民煉氣功，以為這樣便可重新穩定它的統治。但實際上，這些無理壓制只能製造更多更大的民憤和反對者，他們和廣大的不滿人士一樣，將等待時機與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其他階層民眾共同抗爭。在各種抗爭匯合成強大力量爭取到勝利的時候，六四死難者家屬和民運人士10多年來所堅持的要求也定會達到。

2000年6月15日

天安門母親不再悲傷



丁子霖

致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母親們：

親愛的姐妹們，在迎接新世紀第一個母親節之際，我作為一九八九年中國北京「六四」慘案中失去兒子的一個母親，有幾句話想向你們傾訴。

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的不同地區和國家，我們的種族、膚色、語言、信仰不同，我們的生活境遇也不盡相同，但作為母親，我們對兒女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我們慈愛的天性。

但是，作為母親，我們又常常是不幸的。我們承受著比人類其他群體更多的艱難和痛苦。那些由戰爭、饑饉、暴行、殺戮所帶來的苦難，總是首先落到我們作母親的身上；那些由各種天災、人禍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也總是首先襲向我們的心靈。

母親承受更多痛苦。我，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母親，當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國軍隊的罪惡子彈奪去了我年僅十七歲的兒子的生命的時候，當我從失去理智的狀態中清醒過來並意識到我的兒子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邊的時候，我這才真正懂得了什麼是一個母親的不幸和痛苦。

在以後的那些日日夜夜，我曾經在生與死之間幾度徘徊，但最終我選擇了生，因為我知道有更多的母親在同一個時刻失去了自己的兒女，她們承受和我同樣的不幸和痛苦，我必須去尋找她們，同她們一起戰勝恐懼和悲傷，抵禦接踵而來的邪惡與傷害。我們已

經尋找到了一百六十多位「六四」慘案中的死難者和失蹤者，將近七十位傷殘者。在這個數字的後面，站立一百五十多位永遠失去了兒女的母親。這十多年來，我們承受政府方面的歧視和壓力，為了替死者的名譽作辯護，為了向加害於我們的權勢者討回公道，我們不斷地抗爭；為了在中國大地上不再有殺戮，為了所有孩子們的幸福和健康成長，我們不斷地呼喊著。因為我們是母親，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兒女。

這十多年來，我們得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同情和幫助，包括你們——各個地區和國家的母親們，我的可信賴的姐妹們。我這裡要特別感謝一位可尊敬的日本老媽媽吉天美和子女士。在一九九四年的時候，她已經八十九歲高齡了，卻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在這裡還要感謝我的最真摯的朋友露易絲·維勒·斯諾夫人。她也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了。今年四月一日，她不遠萬里從瑞士來到北京看望我，並向我們死難親屬表示慰問和提供幫助。

不要等待別人施捨。

我想，在新世紀的第一個母親節來臨之際，我們有必要重申我們作為母親的責任。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也許我們不能做什麼，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我們有責任用這種愛去呼籲人類的良知，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當然，我們更應該為自身權利而抗爭，而不是等別人的施捨。

祝願姐妹們節日快樂！

二〇〇〇.五.七，於中國

遼寧工人的抗爭

史丹譯

在今年2月，有2萬名礦工把遼寧省楊家站佔領了3天，直至解放軍鎮壓才結束。導致工人佔領這個開採鉬礦的市鎮，是由於礦山因推行私有化而裁員，而工人只能領取按工作年資計算每年560元人民幣的補償費。遼寧省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但該省有6成國營企業嚴重虧損，工人失業率高達3成。所以，受到解僱威脅的員工，無疑等於被判終身貧困。

像遼寧省這般的高失業率，現時在中國比比皆是，只不過遼寧省作為工業重鎮而更加突顯而已。朱鎔基政府在工業部門決斷地推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是造成高失業率的主要成因。

自從中國政府在1996年推行資本主義經濟調整，大幅度向國營企業開刀，已經有3千萬工人被裁員。政府在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更表示，單是在2000年這1年，便會有1千萬個工作崗位被取消。中國工人沒有忍氣吞聲地接受這個現狀。來自香港的監察團體報導，單是在1999年，在中國便發生了10萬宗群眾示威、罷工和抗議。

中國政府要復辟資本主義的決心，不僅表現在削減工作崗位方面。據世界銀行最近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政府把計劃經濟部門打破的政策，以組成所謂的「企業集團」，也在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些「企業集團」在重組之後，有獨立的決策及經營權，不管名義是什麼，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在1997年，已經有120個這樣的集團，其中有66個已經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

至於沒有變為托拉斯的國企工業，則是陸續倒閉，或轉為私有化。這個變化令企業經理及黨幹部大大有機可乘，蠶食工人工資、變賣企業資產，換個名義地把企業轉倒他們自己或近親的個人名下。不過也不是所有幹部官員能掙得好處。例如在1998年，政府下令解放軍須脫離商業和工業利益，便導致軍部損失了許多作為支付工資的經費，因此而令軍隊與國家機器之間產生分歧和緊張。

楊家杖子礦工的鬥爭

楊家杖子礦工興起的消息傳出後，國際的資本主義新聞媒體對中國勞工的鬥爭立即響起了警號。美國資產階級的喉舌報《紐約時報》在4月7日的社論裡，

尖酸地承認「現階段售賣國家的企業和礦場，給許多長期的僱員製造了困境」，又教誨北京「應該正視楊家杖子所發出的訊息」。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們，正確地認識到，在中國這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復辟資本主義，推行「市場改革」，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最主要的障礙。

楊家杖子位於中國東北部，距北京250哩。99年11月，位於楊家杖子的大型國營鉬礦關閉，大批工人聚集到礦場總辦事處，希望就低微的遣散費與管理層談判。可是這所國營企業的管理層沒站出來與工人交手，卻是由楊家杖子市長出來說了一番話。這番話更激起工人的義憤。到今年2月，工人及工人家屬共約2萬人走上街頭，堆起街壘，焚燒汽車，搗毀政府樓宇的窗戶，並且向油鼓縱火。

市政府的反應是謹慎行事，因為恐怕工人把礦場炸毀以自衛。工人奮力反抗公安武警兩天，最後，終於被解放軍部隊鎮壓下去。軍隊是荷槍實彈的鎮壓工人，直接向示威抗議者的頭部發射。

關閉的國營礦場單方面決定，發給工人的遣散費為每年工齡得560元人民幣。這560元人民幣，即使是一個日益蕭條的地區，也僅能擔負一個家庭3個月的生活費。更何況，被遣散的礦工需要從這筆錢中挪出一部份以支付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供款。一位在礦場工作了35年的礦工說，他與妻子兩人合得的遣散費，只會夠用作10個月的生活費。他問道：「那之後，我怎麼辦好？我們吃什麼呢？」

中國總理朱鎔基在去年曾經拿採礦場點名，說礦業是一門虧本生意的頭號例子，所以有必要關閉。可是，其實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市場措施使到採礦「無利可圖」。鉬金屬是用作加強鋼鐵堅硬度的有價值金屬，但礦場經理們則把部份礦場吞佔，並且把礦場分批變賣給他們的親朋戚友。就是這種私有化，使一個國營企業的有價值金屬變得「無利可圖」。一名工人指出：「他們把部份礦場賣給他們的親友，他們出售了礦場的全部貨車，但我們從來不曾見過那些錢……他們把那些錢吃光喝光了。」《華盛頓郵報》4月5日）

「自由市場」的持續深化，正在給斯大林主義官僚之與無產階級及農民大眾之間的重大鬥爭設立舞

台。據中國勞工部的報告顯示，單是去年，便有12萬宗勞工糾紛，這些糾紛包括請願和罷工等等，較1992年的勞工糾紛人數，多出14倍（《日本時報》4月25日）。

安徽省一名高層武警報告說，在該省，已經愈來愈常有「工人集體包圍企業領導人，出言侮辱，甚至在脅迫下把他們拘留起來。」

在去年12月，在中國北部，有1千名礦工因抗議欠薪多月而堵攔鐵路，並且與公安武警搏鬥。大約在同一期間，在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有2,000名退休鋼鐵工人封鎖通往鋼場的道路，抗議被削減退休金。

《華盛頓郵報》在報導楊家杖子的抗爭時表示，這次鬥爭「在中國的城市裡是一次嚴重的動亂，預示著糾纏中國共產黨的亂局」，該篇報導又觀察到，「不過，在農村，當局看來是更願意下令保安部隊把民主抗議搗碎，並且向示威者開槍。」

楊家杖子一些礦工明白，他們之所以被解僱和陷於貧困，是由「市場改革」造成的結果。一名礦工便說：「自從革命以來，我們礦工向來是為中國、為共產黨而工作的。現在，我所在礦場突然的變成了私有。」

人民不滿日漸高漲

許多工人和官員都紛紛緬懷工作安穩的昔日，這是不足為奇的。有許多報導說，在一些失業嚴重的城市，出來抗議反貪污腐敗的人民都高舉著毛澤東像。至於宗教團體法輪功的發展，亦同樣是人民不滿的表現。

台灣最近的總統大選的結果，被北京視為中國大陸境內一個省的叛逆，給它提供了宣揚民族主義及在軍事上摩拳擦掌的機會。國家主席江澤民利用這個機會，宣佈向解放軍的財政預算作出重大讓步，藉此補償軍隊在工業方面的損失。

可是，不論有多少的搖旗納喊或多少的擴大撥款，皆無法彌補由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官僚的領袖們，或可會相信，他們在資本主義復辟的中國是能夠維持一個獨立的角色。但在長遠來說，這將會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一個膨脹臃腫的寄生性的官僚體之所以能夠存在，乃是國家在昔日把資產階級鏟除掉以後，把工人階級置於黨的政治——軍事獨裁的統治下的結果。黨對國有經濟的控制令國家機器得以壯大，然而，在經過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之後，國有經濟無法超越原有的水平。

現在，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得以生長，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建立基地之餘，並且與海外及香港的資產階級建立聯繫。官僚體唯一的重要角色，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具，繼續維持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目前的力量對比或可在一段時間之內，容許官僚作為國家資產階級的主人而存在，但這種關係並沒有長久的保障。

中國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與美國達成的交易，將會在未來損害到官僚體的聚合力。在現實上來說，中國向國際銀行開放金融市場，便勢將促進由國營部門所創立的托拉斯的破產。而更為即時可見的，則是資本主義部門的繼續發展，及向工人階級的進一步進攻，從而令全國工人的起來抗爭節節上升。

這個形勢，無疑將會令黨和國家機器的分歧增加，而其中的一些派別將會借助工人的鬥爭來增強本身的勢力。

工人須有自己的獨立組織

工人最大的需要是擁有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而這個獨立性的形式是由工人自己有一個黨而體現出來。在中國，一個革命的黨必須是從日常的鬥爭裡建立起來，它不僅從過去10年的反官僚鬥爭中汲取教訓，並且也從前蘇聯及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中汲取教訓。

人民的憤怒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爆發。工人和學生的起義令政府的根基動搖，統治者更猶如驚弓之鳥，唯恐再次爆發同類事件。所以政府對待每一次抗議都是動用鐵腕政策，而且堅決不容許有獨立的工會產生。

人民試圖組織獨立社團和政黨的活動不斷發生。在去年，便有多人因企圖組織中國民主黨而被判監10年以上。

儘管政府無情鎮壓，但工人仍然堅持組織，例如，在天津誕生的「保護勞工權益全國協會」，便在全國紛紛冒起。

直至目前為止，工人的抗議仍然是在局部地方發生，而且都是針對一地的老闆而不是政府，而要求也主要是經濟性的。暫時仍沒有跡象顯示，不同產業不同公司的工人正在共同聯繫起來，組成共同的運動，就如1989年所見的工人自治聯會那樣。

（史丹綜合譯自2000年5月號的《工人權力報》、《工人先鋒報》和《社會主義工人報》）

(轉載)

職工憂什麼？

朱運濤

近期，筆者去一些省屬大中型企業進行專題調研，遇到不少職工反映問題。他們說：「你們這些宣傳工作者，能否把我們的心裡話整理整理向上吐露一下？」筆者說可以，只要對企業能有利，對職工能惠及，你們儘管暢所欲言。未料，此言一出，許多職工的話如湧泉一般……憨直樸實的語調中，既對美好的未來有企盼希冀，也在凝重中帶著一絲無奈的沉重。

腐敗現象和吃喝嫖賭問題。職工們反映，我們工作在平凡的崗位，辛勤耕耘，不計得失。可與此相對應的是，一些領導的所作所為讓我們非常寒心。這些人不僅貪圖安逸，而且官僚主義挺嚴重。職工疾苦他們不聞不問，而是本末倒置地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職工們問，到底是哪些人在揮霍，在高消費？部份企業在困境中尚未見曙光，可廠長高級轎車照坐，商品房照買，高檔娛樂場所照去，手機更新得更邪乎……領導自身的不正帶來社會風氣不正，他們自身形象的扭曲更糟踏了黨的形象，依靠職工、密切聯繫群眾的好作風不見了。職工們希望反腐倡廉最好是既抓「小頭」更抓「大頭」，在燈紅酒綠中逮個「油頭」。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許多老中青工人一致共敘，上面講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是企業管理的主角，到下面有的實際上是被換了「湯」。主要表現在一些企業民主管理越來越受到冷落，工人正當的參與權被淡化。有的工人講，企務公開欄是上牆了，可沒有職工代表的監督，誰知那是真是假，況且也未按規定定時公佈，有的半年才換一次，還是為應付檢查，群眾關心的問題沒見，倒是規章條例佔了全欄。再說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可實際上在一些企業成了一種擺設，因為什麼都是廠長說了算。還有民主評議，年年都是列表打勾，一線工人大多在不知其然的情況下做陪襯，就那麼幾個人動動筆就算評議，是實實在在的不切實際。廣大職工都知道自己的家底是怎麼回事，也清楚頭頭是怎樣的人，但結果該是什麼還是什麼。

工人們說，希望企業領導能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真正落到實處，讓職工看得見、摸得著，並在實踐中發揮出作用。

政策執行問題。前些年，為建立企業競爭機制，不少企業實行層層分解承包責任制，一些廠長、經理只顧眼前利益，光拼設備，不投入，結果使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最終利益受到損害。近一段時期，又搞改制，企業紛紛肢解掛牌。不少工人說，企業牌子換了，但一切都還是老框框、舊套套，內部管理依然如故，個別企業還

強迫職工入股，不入股就待崗，股份制成了領導裁減員工的借口。職工們看著經過改制的企業疑惑重重，實在不敢相信一「股」就能「靈」。不少人更擔心地表示，入股的活命錢是否也要「雞飛蛋打」。

更多的職工對減人增效是理解的，但時下一些企業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搞「一刀切」，規定男48歲，女43歲，不切實際搞硬「下」。工人們普遍反映，這個年齡層的從業人員絕大部份是技術骨幹或熟練工，正是掌握嫺熟技能的好時候，「一刀切」下來後，企業技術崗位從業人員素質打了折扣，工種間的相互銜接斷了檔，對企業的損失不言而喻。

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問題。不少職工認為，困難企業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是頭頭問題。他們說，報紙上都披露，明年，廠長、經理經營不善造成企業新的虧損要負責，我們聽了心裡挺高興，但總不能眼看著企業倒閉吧。職工們熱切企盼有一個勤政廉潔、民主決策、信任職工、大公無私、開拓進取、能把工人當成知心人，帶領他們奮力拼搏的好班子。

提高工資及社會保障問題。職工們說，這幾年，下崗的職工是多了，再就業工程的作用發揮得怎樣，很多同志心裡有譜。希望新千年這樣的事少聽說點，最好下崗的事不要讓自己攤上。

去年國家給了企業政策，允許調整工資，但我們中的多數人是漲了「空檔」，有的甚至至今仍未增資的「跡象」。眼看著春節就要來臨，物價已經上揚，職工們不無憂慮地說：好單位都漲了工資，差單位沒漲，這種行業差距已越拉越大，希望有關部門予以重視。不少中老年職工建議，提高職工生活最低保障系數，提高特種行業的稅率來補充政府補貼給困難職工的工資。社會養老統籌的問題，職工們反映的也較多，由於社會各項保障制度才剛剛起步，亟待健全，使得部份職工福利得不到全面保障，表現在有房住不起，看病看不起。國家近年所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企業股份制改革、醫療制度改革都涉及到職工的利益，由於在執行中起點差，超出了部份工人的承受能力。例如從住房制度改革來看，由純福利分房、部份產權到完全商品化，這中間跨度太大，對不少工人來講，是可望不可即。因此，許多工人普遍要求國家在加大住房制度、醫療社會統籌改革的同時，要充份考慮職工的經濟和心理承受能力。新千年，大家企盼都好過。

(轉載自2000年1月29日的《工人日報》)

這是「訊息時代」嗎？

羅賓遜

（一）

今日的資本主義比以往變化很快。巨額資金在到處尋找出路。新的商品以空前的速度生產出來。當今的人都在想方設法去開拓商品的銷售能力，使商品生產能夠不斷地順利進行。

技術革新，特別是訊息和通訊技術的革新，既是變化的動力，也是變化的產物。從70年代末期以來，微處理機的廣泛應用，使生產、消費和休閒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新技術對於資本商品和消費商品的生產都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各商行都急急忙忙進行網上交易，希望找到新的市場，趕上或超過競爭對手。商行通過互聯網進行證券投機，使人不由得想起19世紀40年代的「鐵路狂飆」，想起18世紀初被稱做「南海泡沫」的英國殖民公司——南海公司在南美洲進行的股票投機騙局。許多投機商都明白「泡沫」總是要破的，但他們仍要拼命去試一試。

20世紀末資本主義制度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認為，我們就生活在「訊息時代」、「訊息社會」、或者叫做「知識經濟」社會之中。弗朗克·韋伯斯特就這樣說：「訊息社會就是以知識為基礎，有高級技術，有服務中心的世界」。

（二）

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們聯繫全球化來看「訊息時代」。市場和全球化不是互相排斥的。大量的製造業轉移到擁有賤價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克林頓的前勞動部長羅伯特·萊希認為，未來創造財富的是那些「使用符號確認、鑒定和解決問題」的「分析家們」的事。按照他的說法，屬於這一階層祇佔勞動力的20%。布萊爾和克林頓喜歡揮舞的兩手，一手是胡蘿蔔，即終生受教育和高級技術訓練，有高報酬的工作；另一手是棍棒，即祇得到「麥克唐納式」的教育和低級的技術訓練，「終生勞累」。這兩手使他們的國家陷入新的對抗之中。

布萊爾在1995年曾說：對現代經濟來說，「教

育是最好的經濟政策。未來就是技術與教育的結合。知識競爭已經開始。我們不能在低工資和滿身臭汗的工廠經濟基礎上進行競爭。我們要有自信。我們的人民的智慧和潛在能力，是最實際的經濟。你學得越多，就賺得越多。技術和精明能幹會使我們的生活改觀。知識就是力量。」最近他還說：「我們不能阻礙新的工業革命的到來。我們已經落後了。我們要促進這個革命。企業要領導這個革命。而政府則起關鍵性的作用。」

J·比尼格在1986年發表的《訊息社會的技術和經濟組織》中，列舉75種變化，表明社會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代。「後工業」的權威丹尼爾·比爾直言不諱地說：「工業社會與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科學技術社會的區別，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範疇已經不適用。」他們說：工人階級不再是革命的動力。知識價值論（這是什麼東西呀！）取代勞動價值論。

韋伯斯特認為，這些新的理論表明在造成資本主義諸多變化中思想意識所起的作用。但這些理論對於訊息社會是否已經到來，以什麼為標誌，所說的則是不明確和自相矛盾的。這些理論都傾向於技術能決定一切的觀點。似乎技術是在社會之外的某個地方就存在的。社會對技術則沒有什麼影響。這是技術決定論者的觀點。他們認為，知識技術可以同人分割開來，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而自行發展。他們說：「在訊息技術的背後，社會關係就是計算機二進位數字之間的關係。」

訊息社會的理論家們過高估計在世界經濟中訊息技術的重要性。他們忘記了訊息技術是依賴於商品生產的。

（三）

但，無論如何，訊息技術對於資本主義是愈來愈重要了。資本家為了進行競爭，為了在推銷商品中獲得利益，為了增加剝削勞動力的比率，都需要把訊息技術推向前進。

今天，激烈的競爭迫使各企業公司爭相採取最新

的技術以求得生存。高技術投資可以上溯到40年代。而在74-75年不景氣後的復甦期，這方面的投資明顯加快，85-86年達到36%。在美國，約有50%的投資是用在信息和通訊技術，及製造新的生產設備方面。

爲了替迅速增加的大量資金找到有利可圖的出路，可以採取開闢新市場的辦法（如在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可以進行投機活動，還可以開創新的商品流通渠道。這些都要求用全新的商品來取代舊產品，縮短產品的壽命，加快產品的淘汰。比如今天汽車模具使用壽命已經從過去的七年減到兩年。個人計算機在售出後三個月便被新產品淘汰。

訊息技術使迅速而靈活改變產品成爲可能。舉例說，用程序控制的機械工具來進行設計和加工是很容易的。源源不斷的訊息被用來協調和統一散處全球各地的生產進程。由超級市場和購物信用卡提供的市場和消費訊息可以減少爲市場生產的盲目性。

訊息亦已變成商品，或者說變成商品的組成部份。「智力財富」的產品——如軟件、教育、資訊、傳媒、數據管理等等，現在發展很快。比爾·蓋茨，就是出售系列《Ever Improving》軟件而成爲世界首富的。

今天，來自科學研究、高等教育、顧問、廣告宣傳、雕塑、電影、光碟、新聞網、數據庫等的知識資源都受到專利權和版權的保護。醫學研究和藥物製造現在都是私人投資。投資者保留有生產的控制權。他們還試圖取得有關人、動植物的生命基因訊息的專利權呢。

以前廉價甚至無償使用的訊息都已變成商品。越來越多的公共圖書館已被資料網取代；公共廣播受到私人衛星電台、電報公司的威脅。

訊息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同時也造成失業。在英聯邦，銀行業和保險業就有10萬個以上的工作因採用新技術而取消。加之，訊息技術毋需有人直接監視勞動過程，這就降低了經營和管理的工人的水平。

（四）

「訊息社會」的理論家彼得·德洛克認爲，在「訊息社會」裡，典型的貿易機構主要是由技術專家組成。他得經由同事、顧客和貿易機構總部得到反饋訊息，並把這些訊息編成程序來進行工作。祇有極少數的工作是按傳統常規來進行。這些工作大都是臨時

性的、低技術、低報酬的工作。據道格·肯伍德的計算，在萊希的「模擬分析」中，這些也僅僅佔到1995年美國勞動力的7%。

（五）

訊息技術的發展，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擁有訊息技術的人收入豐厚，反之則收入很少。最近，美國商務部的《數字分析》（「The Digital Divide」）統計表明，「收入在7.5萬美元以上的家庭使用互聯網比收入低於此數的家庭要多20倍以上，前者擁有的電腦也比後者多9倍以上。白人使用互聯網則比黑人和說西班牙語的人多。」

同樣的差距也存在於富國與窮國之間。歐洲和美洲有80%以上的人有條件使用互聯網。佔世界人口1/5的南亞，祇有少於世界人口的1%的人能夠使用互聯網，80%的人甚至沒有使用過電話。因爲那裡根本沒有這樣的設施。

克林頓和布萊爾試圖改變這些數字的差別，而不改變財富上的差別，並企圖使二者能夠協調一致。克林頓就這樣說：「我們的目的就是在最近幾年使發達國家使用互聯網就如同使用電話一樣。這會大大減少收入的不均。」有個印度企業家，想通過衛星電話把互聯網購物的樂趣帶給落後的印度。克林頓也想這樣做，他以爲憑藉發達國家生產出更多的電話、更多的電腦進入落後國家市場就能辦到。他說：「非洲人民和美洲人民並沒有什麼區別，祇要給人民有機會去學習技術，他們會懂得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就能賺得大把錢。」

這就是所謂「訊息社會」解決社會不均的辦法，這個辦法是有意的欺騙。「訊息社會」的理論家們所說的思想意識作用，正好是用來掩蓋社會的真正本質；而且，在新的競爭中，要絕大多數的購買者和工人聽天由命，祇有極少數幸運者才有可能「賺得大把錢」。

當今資本主義的變化，並沒有使我們感到驚異。馬克思早就指出過，資本家會越來越要緊緊地抓住人類共有的知識，並爲了一己的私利去利用這些知識，如此而已。

（蔚然摘譯自《工人自由》月刊99年12月號）

資本主義的純利潤是來自新經濟？

基爾米斯特

自從資本主義早期以來，統治階級一直夢想著要取消經濟上的繁榮和蕭條交替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經濟學家們熱烈地爭論著商業週期性是否已經過時了。

最近兩年來，人們可以看到同樣的想法又在美國流行起來，並且延伸到英國。今年頭兩個月，環繞著「新經濟」的概念，媒體上大肆宣傳。

《金融時報》、《經濟學家週刊》以及《衛報》等連續刊出有關《經濟學的終結》、《電子商務》和最新出現的年輕互聯網百萬富翁等特色的系列文章。

歐洲股票市場在最近兩年中仿照美國例子，並以信息技術股票為基礎正在逐漸地興旺起來。

這畢竟是一時狂熱，或者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發生了什麼重大的變化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由馬克思主義者厄內斯特·曼德爾所著《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的長波學說。

曼德爾分析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持續25年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填平基礎的若干關鍵性轉折點。

當前大肆渲染的互聯網時期和新經濟，實質上是根據下列這個概念的：即這種發展表明長波說中一個新的上升期的開始，它將結束自1973年以來世界經濟的持續下降期。下降期的特點是增長緩慢、週期性的經濟嚴重衰退以及以信貸為基礎的「景氣市場」也是很疲軟的。

這一次新的「長期繁榮」可以與1948-1973年這25年間相比，定將證實股票市場熱以及持續性的利潤增加。

但曼德爾有關這類繁榮的中心點在於：它們不能僅僅取決於一個因素，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大綱》上所寫的：「具體的情況要具體分析」，因為「這是多種決定因素的集中」。

任何意圖要把「新的長波」說成僅僅取決於技術發展的一個因素，那是注定要失敗的。這類發展務必要看階級鬥爭情況，各不同經濟部門的不平衡發展以

及帝國主義、國際經濟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

然而，最老於世故的、經驗豐富的「新經濟」思想的擁護者也承認了這一點。他們的論點是，長期繁榮景象決非唯一地取決於技術發展，特別是在最近20年來的美國許多其他因素匯集在一起，給技術最終轉變為資本主義的持久性擴張提供了條件。

在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僱主們在工作場所採取攻勢的實力及其對工會的影響，以全球化為代表的國際競爭的加強、大型經濟部門，尤其是金融部門中的控制解除了，以及對福利國家的進攻。

這股思潮顯然對工黨領袖及首相布萊爾有很大影響，因為這股思潮進一步認為，上述因素不僅僅為美國的、以技術為基礎的繁榮提供機會，而且歐洲和日本同樣分享繁榮。這一「新經濟」學說在全世界走向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當前的技術發展能否為新的長波說提供基礎呢？要分清有關技術的不同類別是很重要的。例如生物工程這個領域，最終會比互聯網更加重要。

即使在信息技術的一般領域內，電腦信息輸送與電信部門之間的變化，也有很大差異，儘管這兩者連繫越來越變得更密切了。像微軟公司這樣的電腦軟件公司，其初期的增長，是與互聯網完全沒有聯繫的，比爾·蓋茨先生認識到互聯網的重要性，是經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的。然而，當資本主義正在開拓範圍更廣泛的技術時，正是互聯網成了現在所宣稱的新經濟的中心點。迄今為止，雖然有不少文章分析互聯網的正面和負面潛在勢力，但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在資本主義商業經營中、互聯網所佔的位置如何的文章還是很少見的。

可以說，在三個主要領域，互聯網發揮了作用。

第一，公司內部，應用信息技術作為改革調整的出路。這可以涉及到生產本身，而在Unilever的最近計劃中，還涉及到採購、銷售以及售後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所帶來的後果，將是在世界範圍內就業機會損失百分之十，工廠關閉將達到四分之一。

第二，應用互聯網作為將產品或服務工作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方法。迄今為止，主要受到影響的行業是銀行、財政、零售業以及媒體。其他，例如教育也可能隨之而受到影響。

第三，有一大批公司，實際上是以供應基礎設施而獲利的，也允許互聯網在其中起作用。其範圍可從大型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公司直到小型的、可提供各類軟件的公司，這種小型公司能提高向網絡用戶開放的可能性。

此外，還有一種論點認為，只要能更容易地把信息供應給用戶和競爭者，則互聯網的增長將加強了競爭，降低了通貨膨脹，並允許有一個較長的增長期。

大多數「新經濟」鼓吹者都集中在第二類公司。然而，正是在這個領域內，互聯網對資本主義擴張的長期影響可能是最脆弱的。

這裡有兩類主要的公司集團：一類是把它們的產品記入網絡，常常是相對固定、比較大型的公司集團，另一類就不是這樣了。互聯網顯然是某類產品的新的分配渠道。這對於那些在互聯網上交付的產品來說，就更加正確了，特別明顯的是通過MP3軟件的樂曲以及金融服務等。旅遊和文化活動的售票工作同樣是信息技術的天然領地。又如隱藏在Lastminute.com後面的好主意也是可以獲利的。

但當把這一切用來改造某些產業時，其規模很可能仍然是有限的。

書商是最先利用信息技術零售書刊的，由於能大批地把書刊在網址上列出，所以收效不錯。但像Amazon.com那樣的公司仍然沒有什麼利潤。

在美國，股票指數含量為15的最大聯機零售商，據《今日美國》雜誌估計，在去年11月與今年2月初之間，下跌百分之三十一。其他聯機零售商情況便更糟糕。電子——玩具公司股票在一個月內便下降百分之十五，Value America公司解僱職工高達半數，而Beyond.com公司的職工有百分之二十失業，使消費市場的股票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即使互聯網成為作廣告的主要手段，但這也不可能為長波說的繁榮提供基礎。廣告業並非生產資本，而是商業資本，它所代表的是資本家階級內部的資本轉移，既不可能提高生產的總水平和長遠利益，也不可能為改造資本主義提供基礎。

第三類公司，即製造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公司，又怎麼樣？這好比19世紀的鐵路公司一樣，但也有一個重大的區別，這就是競爭更加劇烈。單純地進入網絡並不可能為未來提供持久利潤，這就是最近各大公司合併的幕後原因。

為新經濟大肆宣傳的背後，其真正實質性問題就是以互聯網和互聯網的使用作為調整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然而其意義有多大仍然是很不明確的。誠然，美國製造業生產力的增長，以歷史標準來看，確是很迅速的，去年（1999年）高達6.4%，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但也許不能持久。

生產力的增長是以投資（主要是外國資本）的巨額增加為代價的。這就意味著利潤率仍然相對地低。信息技術是否能使利潤率不斷提高呢？現在還言之過早。

如果上述情況屬實，那麼基於互聯網的投機股票泡沫以及繼之而來的美國消費者破紀錄的借債，必將帶來的不是新的黃金時期，而是過去二十年中我們已經看到的資本主義危機，這危機仍然是舊體制中，因信貸問題而點燃起來的。

（黃申摘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2月號）



歐盟向世界霸權邁進

韋卡曼

在公元2000年底，歐洲聯盟諸總理和國家元首，將在法國某處聚會，舉行又一次跨政府級會議。元首們給自己訂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向世界霸權邁進。他們懷著這個目標，對歐盟的現行結構作出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在巴爾幹戰事期間，美國一再令歐盟蒙羞，威脅到歐洲內部的團結。只是由於1999年1月歐幣的成功推出，才令歐盟的機關架構不致崩潰。由歐幣所撐腰的成功「抵禦」，再加上歐盟頭一次共同面對戰事的集體經驗，得以把歐盟牢固黏在一起，繼續向前邁進。從歐盟誕生以來，它首次敢於把自身界定為獨當一面的全球霸權。

社會民主派意氣風發

歐盟之能重拾自信，歐幣只是成因之一。此外還有其他的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助成其事。

隨著1998年社會民主黨在德國當選，組成了舒倫德——費雪政府，就在歐盟的指揮高層掀起了政治和機構方面的新氣象。

社會民主派席捲整個歐盟。在15個歐盟政府中，其中有11個社會民主黨政府，另外兩個聯合政府。在這個驕人的成績下，令歐盟的部長級會議變成了一如西班牙右派總統所抱怨的——「第二國際會議」。

歐洲政壇上前所未見的政治同一性，對資產階級非常便利。資產階級黨派在經歷了1996-1998年連串的大選失敗後，在歐幣問題上無從勝任推動「歐洲人」突破的先鋒角色，而且相反，更是歐幣問題令右派陷入身份危機。歐幣問題令法國戴高樂派和英國保守黨人分崩離析；而在德國，即使由前總理科爾領導的基督教社會黨和基督教民主黨陣線，亦不敢碰這一個燙手山芋，以免觸怒德國工人。

1990年代的社會民主派一向忠於新自由主義，支持親歐洲立場，歐幣問題令他們當時得令，大展拳腳。他們令歐幣平穩順利地過關，擔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兼且在部份國家的綠黨支持下，連消帶打的令工人和年輕人在巴爾幹戰爭問題上貼貼服服，沒生多少麻煩。

就在1999年1-6月歐盟的德國總統大選吸引了眾方注意的時候，英國首相貝理雅——而不是德國領袖舒倫德——在第二國際和歐盟內採取了主動性。貝理雅主張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鼓吹歐洲軍事自主，盛讚歐盟現有機構。他在三個大題目上和英國社會的傳統價值決裂了。在接下來的2、3年間，他需要發動實在的政治鬥爭，以推行上述的歷史性轉向。

扶植羅馬諾·普羅迪出任歐洲委員會主席的動作，造就了一支生氣勃勃的政治聯線。貝理雅之大力鼓吹普羅迪，絕不是毫無來由的。普羅迪簡直就是貝理雅天衣無縫的設計的化身：他是由社會民主黨人選出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他是在政壇（而且是意大利政壇！）浸淫過的技術官僚；他是深富辦治國有公司的經驗，兼且又全盤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深的公務員；他是主張新科技的新自由派和現代派，兼且又是大力鼓吹基督教式社會工作的義工！

普羅迪主張的方案，反過來亦是為了協助貝理雅贏得未來「英國大戰」而設計出來的。因為，要是英國不加進貨幣聯盟的話，普羅迪也同樣會失敗。

歐盟機構改革

就是來臨中的「英國大戰」，促使普羅迪選擇新委員會，及對歐盟的機構作出大改革。因此，由英國前首相金諾克出任歐盟副主席，及主持布魯塞爾機構內部改革的委員長，就不足為奇了。

金諾克甫上任便立即裁減全職職員的數量，並且調動高層職位，以此來把若干國家對委員會機關作局部壟斷的狀況打散。至於歐盟機構本身，一份被稱為「3個諸葛亮」的報告作出了如下的改革，以加強歐盟的決策能力：

1）取消各成員國目前在部長會議所享有的否決權。目的是盡量推行多數制，以讓歷來「非正式」地設定議題的3大國（德、法、英）更加如魚得水；

2）賦予委員會主席在委員會內享有全權；

3）加緊共同外交、保安和負責這些事務的機構之間的聯繫，並且由部長會議取代委員會來擔任這個角色。事實上，目前主持歐盟共同外交及保安工作的部長蘇蘭拿（法國）在這當中會起著關鍵的作用。此

人是從「北約」調用過來，即將出任歐盟部長會議的秘書長。至於蘇蘭拿在「北約」的空缺，將由英國前國防大臣羅拔臣出任。真是閉門一家親！

4) 除卻把實質權力集中到高層，「接著是把歐洲議會的多項事務列為「共同決定」的範疇。

5) 最後，是更改歐盟諸項條約協定，一方面是要要求各成員國遵守最基本的憲章式的規定，另方面卻是讓各國更富彈性地落實推行。

歐幣帶來的動勢

在邁向建立一個超民族國的「政治性」的歐洲的過程中，歐幣是一個里程碑，給予這個專權化的「建國」過程以養料。在推行歐幣的時間表的限程內，有兩個大障礙：第1是到2002年1月，將在市面流通歐幣的紙幣和錢幣；而到了7月，將陸續完成回收國家的貨幣。到了那個時候，普羅人民將首次在日常使用中接觸到這種新貨幣，預料這將對「歐洲人」的意識和經濟行為（儲蓄和花費）產生重大的衝擊。第二重障礙就是英國是否成功加入貨幣聯盟。在這方面，由於英國的經濟周期遠遠落後在歐盟其他主要國之後，而英鎊兌歐幣又高過實際的價值，所以在經濟和貨幣方面存有著風險。此外，英國也存有著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的風險。歐幣之取代英鎊，將讓為數不少的少數英國人看成是「歐洲大陸」的手下敗將；同時，也象徵著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的衰亡。

在英國呼風喚雨的資產階級高層，認為加入歐幣是愈快愈好，但他們卻希望貝理雅來一次無驚無險的全民投票〔以便得到民眾認授的合法性〕。為此，英國政壇出現了百年罕見的跨黨聯盟，以示全民動員齊齊晉身歐洲的意向。而在反對聲音方面，是由保守黨中最富沙文主義精神的一翼所領導——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領這支反動勢力，捲土重來。現在，貝理雅所面臨的決定，是要決定到底是在2002年5月大選最後限期之前或之後舉行全民投票。

總括來說，在未來兩年裡，歐幣要是能克服上述兩個難關，它便會進入全新的時期，得到橫掃千軍的效應。首先，歐幣將由於倫敦金融市場這個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易市場的加入，而會在經濟上得到突破性的擴張。其次，它將把其他仍然留在歐幣外圍的國家席捲進去，例如丹麥和瑞典。在這一點上，由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的銀行、保險和電訊體系，正在進入合併時期，挪威因此也將受到重大的壓力。至於目前仍然處在歐盟及歐幣外圍的瑞士，其資產階級也勢將躍躍欲試，一併加入大團去。

第三，在東歐，將發生「歐洲化」的效應。歐幣將取代德國馬克現時的霸主地位而取代東歐本國的貨幣，或成為掛鉤的對象。到最後，假如一切順暢，歐幣將促使歐盟各國的金融市場統一起來，從而促進資本在歐洲的流通度，及迫使歐洲稅制劃一化。

歐洲軍事自主的前景

在歐洲軍事自主的問題上，歐洲聯盟本身正是萬難之起源。任何軍事工業，都關乎國家在保衛民族主權的重要方面作出讓步，況且，各個民族國也須向歐盟付出更多軍費預算。這在各個民族國大刀削減財政預算案的時勢下，就意味到勞動人民需要負擔這宗額外的開支。換言之，除非國內有軍國主義的興起，否則統治者便很難得逞。不過，在歐盟發施號令的上層，仍是一意推行軍事自主的方向。3個主要大國（及意大利）認識到，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利益就繫諸於此。

對德國，這個方向能令她新近發展起來的「經濟新力量」在軍事方面有小試牛刀的機會，而這若能在國際層面進行，更會是理想不過。

對法國，她一向縱有核子設備，但是巴爾幹一役把該國在民族自主所涉的運作、科技和產業方面的弱點暴露無遺。

對於英國，誠然有著重大的經濟理由而導致她全身加入歐盟，而在歐盟的「共同防衛」架構之內，她更是利害攸關——在所有歐盟成員國裡，英國是唯一具有全球軍事角色的最佳準備。

沒有自主運作的共同防衛，就像劍不開刃；這要求國家傾力到產業計劃科技、生產和研究方面的總體發展，置民事和軍事工業於模糊的界線。美國在這方面是遙遙領先。歐洲若是效法這個方向，將令歐洲與美國的資本主義競爭受到首當其衝的衝擊，影響深遠。

美國誠然是充份地留意到這一點。在結束波斯尼亞戰爭的戴頓條約和處理科索沃問題的朗布葉會議，歐洲外交界俱不在場，再加上用在巴爾幹戰爭上的強大軍事力量，所有這些，在在都由於剝奪了二次大戰後的秩序，及引發了由波音公司、洛歇公司和威方公司把持的跨大西洋兩岸的公司合併，這種種狀況俱將危害到歐洲的國防工業，使之分崩離析。

繼柏林高峰會議之後，歐洲各國政府都向戰爭工業施加壓力，以讓這個工業之間有系統地互相合作，邁向條理化，從而建立一個強大的防衛歐洲的實力。

英國政府在這個目標下尤其活躍。羅拔臣在就職

「北約」秘書長的誓詞裡，提到美國對歐洲自主的曖昧立場。然後，在隨後數個月，人們看到泛歐洲間就製造先進導彈的合作急激增加，而且歐洲政府也更多談及特別優待「歐洲製造」的軍事硬件。

來自美國公司對這種發展的公開抗議，以及克林頓一再召喚貝理雅，在在顯示出局勢有真實的變化。

朝向建立「大歐洲」

普羅迪宣佈：「在未來25年內，將把歐盟從現在的15國，擴充至20國，25國，以至30國。」普羅迪這種說法，是有歐盟領袖的共識為基礎的，從而他能開步向東歐進軍。

「擴大」歐盟的政治意圖，是爲了在東面締造一個平靖的屏風，以讓西歐首府無東顧之憂。其中的目的，是逐步創造一個單一的歐幣市場。事實上，這個計劃已經在進行之中。歐盟（尤其是德國）與東歐的貿易已經取代了前蘇聯，成爲東歐最大的貿易夥伴。只不過推使東歐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代價是十分的複雜和高昂，這從前東德的經驗赫然可見。歐盟並不準備擔起這個龐大的代價。現時，在歐盟的預算裡，用在這方面的開支，仍然微少，只佔歐盟生產總值的1.1%（而且上限設定在1.27%）

由此可見，歐盟「擴大」的目標，完全不是用高度的社會標準來作爲會聚的條件，它只不過是任由市場的作用，令整個又整個的社會部門肢離破碎，從而爲資本主義（重新）作安排，繼以達到帝國主義併吞的結果。這就爲東歐地區締造了持續的動盪，令戰爭和社會動亂此起彼伏。歐盟用來爲軍事自主作辯解的強有力的論句，就是說要把歐洲東部的衝突制服。推而廣之，更是「加緊邊境防衛」、「控制流民潮」，從而成爲制定國策的理據。

我們不該忘記，歐盟旨在擴張的這片東部的土地，是十分的廣袤巨大，包括有歐洲大陸所餘地區、環繞地中海的地區和「北約」的東南屏風（俄羅斯、高加索、土耳其和中東），換言之，就是國際勢力各種變幻無窮的組合歷來必爭之地。此所以，歐盟的優先目標，就是把驅策其轄下的整部壓迫機器放在首位。

現在，歐盟所希望的躍進，就和它在1985-1993年所做的一樣規模，同樣的饒有深意。歐盟的新目標（貨幣統一、防衛自主、擴大版圖，及樹立法理機構），在在俱要求歐盟的國家機器有著大幅度的擴充和加強，不論這是由擴大超民族國所處理的事務，或壯大現有的跨政府合作機關來達致也好（或兩者兼而

並進）。當這方面的事態取得實質的進展，這個發展便將富有更爲深遠的意義。

與此同時，以歐洲爲基礎的跨國資本急激增加。就在去年，在「收購和合併」方面，出現了實質的變化，儘管在這方面仍不能與美國看齊。可是，正就在美國的「收購和合併」的活動處在18個月來的最低水平之際，歐洲在這方面的活動超過了美國，並且是在7年來首次超過美國的水平。

歐盟建立超級霸權

歐洲的大型公司在美國進行的收購率，較諸美國在歐洲的收購行動多出3.3倍。資本流通的方向也發生了變化。還在數年前，歐洲跨國公司之傾向在大西洋兩岸哪一端進行合併的意向，還不是十分明確。現在，合併行動的重心確定無誤的是在歐洲內部發生。在短短9個月裡，合併行動的價值額增加了一倍，高達6.883千億美元。

就在這個領域，也出現了在政治方面饒有興味的兩項新發展。第一，歐洲的跨國公司就在歐洲本土鞏固基業；第二，它是發生在傳統以來經濟和個人與民族及國家機構最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那些部門：銀行業、保險業、電訊業、武器業和公共事業（煤氣、水、電）。

歐洲的資產階級日益面臨這兩種選擇：追求歐盟的宏圖大計，或是讓這項大計落空？要是後一項選擇得逞，結果便會是把過去15年來的〔歐洲〕發展扭轉，實現跨大西洋兩岸的公司合併，也即是在美國公司的羽翼下，實行歐美公司合併。

主要的衝突是正在全球進行重組的資本主義與國際無產階級的衝突。歐盟的工人階級縱然有過失敗，有著意識形態的退卻和結構性的弱化，它仍然是組織得最好、最富有覺悟性、最政治化的社會力量。在歐盟追逐權力與光榮的道途上，工人階級將是最重大的障礙。

我們不知道歐盟將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它的強權夢想。但所有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必須提升到更高一級的鬥爭水平。我們必須逐點反對「他們的」具體政策。我們必須爲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另類出路而戰。

而且，在歐盟下一次的重要聚會——在2000年底在法國召開的跨政府會議——我們必定不能錯過這次龐大的動員的機會。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2月號）

日本警界組織性腐敗現象一瞥

高島義一

前幾天，神奈川新潟縣警察當局逮捕了該縣交通機動隊隊長和駕駛科行政處分股股長，原因是他們受眾議院議員、原自治大臣兼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白川勝彥的秘書唆使，暗中了結支持白川勝彥的某人違犯交通法規的案件。像這樣的有政治家介入、掩蓋犯罪事實的案件，迄今為止時常發生。這是繼前不久爆出的「神奈川縣警察醜聞」之後又一起震驚全國的事件。

此外，諸如吃請拿要、麻將賭博、接受游樂招待及殺人、搶劫、暴力傷害、盜竊、恐嚇、詐騙、吸毒、販毒、持槍犯罪、性暴力犯罪、捏造、行賄、受賄等警察個人的多種多樣的違法犯罪行為，仍歲歲年年、反反覆復地發生在全國各地，而被發覺和揭露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份。下列幾種以及政治竊聽、拒辦刑事案等組織性的腐敗現象，也還在發生和蔓延。

接待諸侯

在有著極其僵硬的唯上是從的「等級制度」的警察界裡，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後經官僚階梯爬上來的全國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警察總部的部長，就是上列標題中所稱的「諸侯」。

每當部長預定巡視手下某警察署時，接待的準備工作從幾周前就開始了；從部長喜歡吃日本式還是西洋式的飯菜，愛喝哪種酒，到介紹怎樣的餐館給他，送他什麼土特產，等等，在署長的親自指揮下展開調查、研究，……部長駕到的當天，所乘黑色高級轎車經過之處，都派有警員、一路綠燈；署內全員集合，在門前敬禮、迎接。而部長的「巡視」並不直接去基層，也就是沿途看看、草草了事，然後便開始享受招待。

這不是亂說、吹牛，而是絕沒有混淆的事實。三笠書房出版的丸山升寫的《崩潰！日本警察》一書就記載了，一九八八年八月某日，在高知縣伊野町內的河中蒐尋溺水失蹤的某青年的關鍵時刻，已出動去救援的伊野警察署的警員們中途幾乎全部撤回的事件；

原來是因為上任不久的高知縣警察總部部長那天到伊野警察署巡視，那些警員們按照既定的歡迎計劃的配置，在部長預定到達的時間將臨時一齊從救援地撤走。結果，到第二天才發現那青年，但人已死亡。得知了撤退理由而憤怒了的居民們舉行抗議，引發了縣議會的辯論、質詢，而那個部長只是表示「考慮不周」和「遺憾」。

貪污挪用

沒有任何人相信某些人關於上述接待的費用是自掏腰包的說法。全國的二十五萬警察，人人都是心知肚明。那接待費用是從警察預算即納稅人的稅金中掠取的大筆行賄款；這背地交易的錢的主要來源，是蒙著最厚的面紗的有關公安的巨額預算（國家的大約為兩千五百億日元；地方的大約為三萬億日元）。原警視監（級別僅次於警視總監）松橋忠光在其著書《我們的罪過常在我們跟前》（起源出版中心出版）中寫道：總務科的科員使用全警察署人員的非正式的私人圖章，有計劃地偽造收據和假帳本，一個勁兒地擴大「小金庫」；幹部們則隨意地揮霍這筆高額公款，大部份用來宴請上司，發放獎金；「警察實際用於工作的經費只有原本得到的三分之一」。

大野達三在其所著《日本的警察》（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參照「島根縣警察文件」和松橋忠光的著述等許多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警察經費的「三分之一被幹部瓜分，三分之一用於宴請和送禮，剩下的三分之一才用來工作」。雖然全國各地不斷有警察內部的告發和原警察的揭露，但會計檢查院的財務檢查往往因為遭瞞抗、裝糊塗而走過場。幹部們貪污、挪用，數額巨大（甚至達到可建私房的程度），自知有罪，為堵人嘴而對部下的學樣犯罪（例如將民眾拾到後送交來的錢財貪為己有）、過份要求等眼開眼閉、袒護遷就。

掩蓋醜聞

圍繞神奈川縣警察的犯罪違法事件，1999年11月24日的《讀賣新聞》報披露了一份發至縣級和正副署長級警官、題為《醜聞案等的處置要領》的內部文件，其中這樣指示：「醜聞（日文原用詞是『不祥事』，直譯成中文意為『不吉利的事』、『不幸的事』），除了對社會有很大影響的場合之外，不宜積極地公佈。這與其它團體、組織的情況是同樣的，並不因為是警察而無論如何必須公佈。固然，對它的內部處置必須嚴肅、公正，不過，一旦報導出去，不僅將降低普通民眾對警察的信賴感和絕大多數始終認真、默默盡職的警員的士氣，以及傷害警員家屬的感情，而且也有可能影響警察事業的改善和發展；因此，只是出於擔心與新聞界發生摩擦的簡單考慮而公佈醜聞是不行的。」

結果，那個吸食興奮劑的神奈川縣的警察，被以「不倫」（亂搞兩性關係）為由做了退職的處理。而通常，日本的普通企業，除了造成社會問題或引起企業內部紛爭外，不會只因「不倫」而叫員工辭職的。宮崎學先生在反對「團體規制法」的集會上報告說，光東京警視廳管區內，去年一年中以「不倫」的理由做了退職處理的警察，就已增加到兩百人。想來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同那個神奈川縣的警察一樣因為犯罪而遭到那種處分的吧；也就是如同按照《讀賣新聞》報揭露的《醜聞案等的處置要領》，被暗中遮蓋、絕不曝光地做了處理。

（馮克瑞節譯自日本新時代社2000年3月27日發行的第1626號《橋樑》週刊，高島義一著：《與警界腐敗鬥爭的抉擇》。譯於美國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內的ODU。標題係譯者所增改。）



新潟県警本部長謝罪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方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克林頓和國會要「挽救」社會保障

溫斯坦

克林頓總統和美國的兩黨會議，根據一個瀰天大謊，對社會保障發動為期十年的攻擊。

新聞媒介曾經發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生的人，很快就達到退休的年齡。人們借口投入社會保障，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庫的稅收將不能如期償付開始大量退休的這批工人的年金需求。

從那時以來，傳媒就用一種聲音宣稱：社會保障注定要破產。

但是，你毋須充作一個火箭科學家，去斷定社會保障破產的神話，主要是想為要一種合理化的服務，而堅定地削減受益和推遲退休的年齡。這些削減，肯定是最劇烈地打擊那些最依靠社會保障金和依靠醫療照顧而生存的人。

1998年，資本家對社會保障的攻擊升級了。這是由於驚奇地發現，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了盈餘，聯邦政府各種稅收超過總支出，而財政盈餘原本會持續到可預見的將來的。

1998年，當第一次宣稱預算盈餘被發現時，它被武斷地安排在可預見的將來，可實現進一步的盈餘。

在設計有數萬億美元意外得到的基礎上很好地進入新的一千年，它第一次被建議把它的大部份投資到股票市場去。

自從高漲的股票價格已膨脹到遠遠超過它們的真實價值，而大量的數十億元系列基金投入了股票，將股票市場升高到環繞月球的軌道，那個計劃看來已被放到次要地位。

自那時以來，新聞報道也預言一個預算盈餘的總數，想要經過第二個十年，增加到2萬9千億元（紐約時報社論1999年7月22日）。社論撰寫人也報道：「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原則上同意由社會保障稅產生的1萬9千億元（在同一個十年期間）將回到那個制度，很好地保持它的償付能力，直到下一個世紀。」

那就是說，他們議定這兩個資本家政黨將為保持1萬億元而奮鬥。

傳媒似乎未去注意，那些花在各種各樣社會保障的錢比由它的受益人付給的要少得多，那是使人震驚的。它證明，只在十年之間，從按週計算的薪金中扣除的社會保障稅比支付退休金和相關的福利費用還要

多，使之「順利地進入下一世紀。」

並且，那還意味著從來就沒有一個逼近的社會保障基金的破產。

但是，它也意味著，估計有數倍於1萬9千億美元的過去的社會保障稅，現在作為欠條存放於聯邦國庫財政總賬的「資產」項目，本來可以用作擴大而不是減少領取退休金者和享受醫療照顧方案病人的受益。

記下社會保障赤字的神話是重要的，而現在預算盈餘這筆意外之財，實際上通過全體資本家建立的機構被當作好錢幣接受下來了。

只需短暫地一瞥，這筆使人震驚地意外得到的預算盈餘是怎樣計出的，將表明它充滿了含糊不清和矛盾。到最後，這些事實全部加起來，這個真理被統治的資產階級和它的政治僕從們全部踐踏了。

舉個例子，6月29日的《時報》報道，估計下一年度預算盈餘為250億美元，它預計，經過下一個5年，盈餘增長到1,790億美元，並且下一個10年盈餘增長到5,170億美元。

相應地，15年之後（不是10年），他們估計只有7,210億美元的總額，比《時報》編輯幾週之後所引證的上述數字少得多。

單只這一個矛盾就引起一個巨大的問題，即使標誌著甚至只一年的估計，而且，當規劃有5年、10年或者15年，進入到未來那麼長的時間，它就會變成我們所能期望的、從一個講述命運者那裡凝視水晶球這一類的事情了。這個問題和大量的其他矛盾，在被說成的事實裡，就我所知的，決不是合適的解釋。

社會保障的騙局

事實上，資產階級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謀劃促進它的階級利益，而擺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的，是有系統地在本國實現減少商業成本，並且這樣來提高美國公司的利潤率，影響他們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對手。

而且，肯定地，資本家們這樣的獲利，就是對工人們的損失。

在消費方面，美國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降低，已有數十年長的記錄。這證明它有利於資本家。這個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進攻，是由生產方面和以後由資

本家的稅收政策兩者來實行的。

從二次大戰前以來，賦稅的負擔就被穩定地從資本家分攤到工人身上。更進一步的稅額負擔，就從社會福利有系統地減少中產生。這種負擔是由工人階級直接和間接支付的。

減少美國資本家的稅收，這就增加了他們稅後的純利。它純粹地為美國資本家的低成本高利潤作出貢獻，並影響到他們的全世界的競爭對手的成本和利潤。

那就是為什麼在國會中圍繞著社會保障的騙局產生出一個兇暴的策劃，這就是進一步對富人減稅、對窮人提高稅收，並且真的使社會保障退休金和醫療照顧方案的受益下降。

要完成這1萬9千億美元是有可能的。據新聞報道說：這些錢要跨越下一個十年，是由社會保障稅收中產生的，並且據說被嚴厲批評後，才恢復這個制度。

但是像這種社會保障基金現在還當作紙上的借條，好像它們是真正的貨幣一樣放在一系列的資產負債表上。即使說「償還」真的兌現了，將毫無疑問地是作為借條償還罷了。

克林頓醫療照顧方案的詭計

克林頓總統正在尋求為被說成是意外的預算盈餘取得充分的信任，現在對接受醫療照顧方案的病人承諾一個自願長期使用藥物保險的「禮物」。

「自願」這個詞含有另一種詭計。既然它集中在受益上，保險費卻又要由醫療保險方案受益人支付新規定的保證金。這項增加了的費用，醫療保險方案委託人必須償付處方藥物的受益。在2002年，這項附加費每月24美元，2008年提升到44美元，對於那些僅僅得到貧窮水平的年金的退休者，那不是一個小數額。

此外，處方保證金需要50%的共同支付的款項，政府限額僅僅給予2千美元的一半，作為一年的處方費用。

正如俗話所說：「貪得無厭」。因而附加費用對那些在被推荐的處方計劃上簽字的人，例如：一個醫療照顧方案的病人要為實驗部門負擔20%共同支付款項，在現存的醫療照顧方案中卻不需要這樣的一筆開支。如果過去的實踐有什麼指引，當所有的細目曝光的時候，從這些自吹自擂的藥物處方支付計劃中，這些費用對所有的病人更可能超過他們的任何受益。

會出現什麼真實的情況呢？不管怎樣，真正的受益者將不是幾千萬依靠社會保障和醫療照顧方案者，更確切地說，它的受益者是醫療保健組織、保險公司和醫藥公司。誰只需簡單地擁有更多的住房，就可以

向醫療照顧方案的病人高價索取交換所謂「免費」的處方藥物和其他被指稱的受益。

當此之時，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客正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黨尋求政治利益，從承諾條件、延長協商怎樣處理這些剩餘額來中飽他們自己的私囊。

冷酷、溫情手法的遊戲在持續

在國會中的好人與壞人之間無止境的爭吵和交易已經開始了——儘管決定誰好誰壞只在旁觀者的眼中出現。

至少有40%的美國選民確信，在資本家的政客之間沒有不同的地方。這種經驗已有很長時間。較少的合資格選民有討厭登記或選舉的傾向，這是已為人知的事實。

經驗也提出，立法對怎樣處理所稱的大筆預算剩餘，是預先規定的。假設那大筆預算剩餘的神話在總統選舉之前沒有好好地被戳穿，無論如何，它就能有把握地預告，對富人的承諾將要維護，而對我們其餘的人的承諾，將如通常那樣被拋棄。

壞人和好人之間的「戰線」已被拉開了。民主黨和克林頓一起領導的一夥已經標明他們的行動範圍：第一，他們保證用想像中的預算資源現金支付5萬6千億國債；第二、把前面提到的處方藥物受益計劃其餘部份給予我們（順便提一提，這些計劃不顧報道過的4千萬美國人沒有足夠醫療保險的困境）。

長久以來，共和黨人為了他們的黨，標榜嚴厲警察的角色，集中他們的要求大量減稅，這就只能留下小小餘地來支付國債或處方藥物的受益。

此外，共和黨人以他們在嚴酷警察、溫情警察的遊戲中的角色，要求更多的大份額減稅，只由很富裕的有錢人納稅。為了企業，他們列出清單：首先是減低利得稅率；逐步地完全結束房地產財產稅；和停收寬幅度的公司特別利息。

經驗也告訴我們：實際上壞人、好人一直幾乎毫無掩飾，以接近壞人的要求而妥協結束。因為這就是這個遊戲的簡單理由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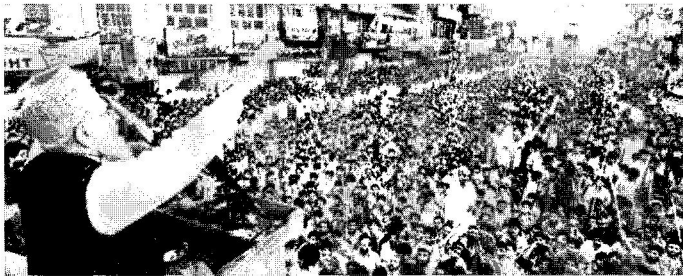
但是在國會中因為新的立法有另外一種貪婪的界線外的遊戲在所有的交易中繼續進行。內部的猛烈爭吵和交易，在同意投票產生任何立法之前，每個政客都必將要求對法案加以修正。

這樣的議案修正案是預先設計的，除了為每個和所有的「公僕」的利益服務之外，不是為別人，而最重要的是為那些公司老闆的利益而服務。

（楊萍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8月號）

巴基斯坦：絨手套內的鐵腕

馬奎斯



〔恩朱姆·麥爾沙（Unjum Mirza）對積極分子和作家麥克·馬奎斯談關於巴基斯坦軍事政變後現在的情況〕

軍事統治巴基斯坦一半以上的領土已有50年的歷史了。每一次它一直都自稱以人民的利益，反對腐敗，復興民主而取得了權力。最近由穆沙拉夫領導的軍事政變，有不不同的地方嗎？

在南方旁遮普的公路上，我看見有政府標誌的透露的諺文說：「親愛的同胞們，軍隊將不使你們像過去那樣失望。穆沙拉夫。」軍隊現在對最近的軍事政變當作穆沙拉夫事物。它宣佈了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日程。這次軍事政變，起初不是從維護巴基斯坦人民利益的名義，來發動反對無法無天和驕傲自大的謝里夫政府，而是為了謝里夫更換穆沙拉夫作為軍隊的首腦——作為被選舉出來的總理，謝里夫有權力這麼做。

在巴基斯坦，政治的畸形其原因不是民主太多，而是太少了，甚至選舉出來的政府上任了，軍方仍小心翼翼地約束他們的行動領域。許多長期積累下來的國家問題，都可以追蹤其根源，它曾為右翼宗教派系提供資金，促進和武裝他們，曾經串通毒品交易，數十年來吸吮了國家的一半預算。恩賜和腐敗的文化，這是穆沙拉夫現在所猛烈抨擊反對的，數十年來這種文化在軍隊裡產生極大的影響。

現在軍方正正在瞄準全巴基斯坦社會。軍方官員曾經任命一批廣泛的各種不同的公共機構高層人物，從地方和市的行政到鐵路，水力發展權力機構、大學、航空、公正委員會，它也建議「經濟監督制度化」——公開地堵住偷漏稅——同時從事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改組」日程。這就是布托和謝里夫兩人的政策。現在不同的只是軍方所進行的對於涉及不得人心的選舉並沒有干預。在短期內的趨勢，意味著爐油（一種主要的

日用品方面的加價，一般銷售稅額的徵收，火車票價的提高和實際存在的失業。

謝里夫的繼續攻擊巴基斯坦平民的辯解，他們以緘默的態度回應軍事政變和繼之而來的他的被捕。什麼是其他反對黨的回應呢？布托的人民黨或者炎蘭·克哈罕（Imran Khan）的Tahriq-I-Insaf？

這兩個政治大黨——布托領導的人民黨和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PML）——兩個都廣泛地不予以信任。起初從穆斯林聯盟分離出來的，受到驅逐的巴基斯坦勞工黨明確地譴責這個軍事政變。現在穆沙拉夫明確地說，他決不把權力交給謝里夫或者布托，而且任何還政於民，都會延長不穩定的局勢。人民黨、穆斯林聯盟和許多以地區為基礎的政黨，都要求結束軍事統治。炎蘭·克哈罕的T-I-I已加入右翼的宗教黨派，要求軍方：「首先，有責任說明義務；然後進行選舉。」這是來自一部份知識分子的反響，他們爭辯說：要害不在於歸還民主，除非軍隊首先清除國家的腐敗政治。

軍方已發動一個高調的「有責任說明義務」的運動。並逮捕了主要政黨的幾百名政治人物。顯然，一個嚴肅的、公正的和透明的清算運動在巴基斯坦是必要的——但是，那並非是從軍隊提供的。首要的是軍隊本身和司法部門（它對清算運動提出起訴）已經明確地拒絕接納調查研究。第二，起訴是專斷和獨裁的。被控告的政治犯長期被拘留沒有處理，而當他們到達法庭之時，沉重的證據就會落到他們身上——他們要求證明他們是無罪的。

這些都是表演性審判（對謝里夫在卡拉奇的受審，是最大的和最公開的，這個審判會被導致判死刑），對受害者的表演式審判，雖然是他們當中一些人在巴基斯坦社會中是最腐敗的剝削

者，但這樣性質的審判只會進一步殘酷地對待巴基斯坦的「合法」政府。軍方的演出領導一個運動來反對不負責任的政客（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長期是軍方的委託人）是已經逐漸失敗了。隨之而來的是暗殺謝里夫的律師，最近並且嘗試控告他的妻子以最大的叛國罪。鐵拳正在進行穿進絨手套的表演。

直到現在為止，人民黨和穆斯林聯盟曾經勉強地煽動群眾去反對軍隊的統治。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不能肯定誰會聽從他們的號召。他們在政府中的行動在最後的十多年中已經腐蝕了他們自己的社會基礎。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確地保衛人民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政治家們的公民權，和作好政黨的參選權。但是我們不會指望他們去領導抵抗軍事統治。

穆沙拉夫把他自己當作20年代土耳其非宗教主義者的領袖亞塔吐克。伊斯蘭教徒支持軍事政變。可是緊張的氣氛正在出現談論巴基斯坦的塔里班化，而在軍隊中，伊斯蘭教的影響正在增長。什麼是伊斯蘭教的真實力量？它有希望增大影響嗎？

作為一個自由的非宗教主義者，至少在西方，穆沙拉夫的地位一直在提升。可是在軍隊的高層領導中有多少人在運動中是一致的？在這裡，風向右吹，而強硬路線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在穆沙拉夫周圍佔據了許多重要的位置。穆沙拉夫親自作了一次演說，號召全部聖戰團體——武裝的右翼原教旨主義者——團結在統一指揮下進行戰爭，反對印度進入喀什米爾。歷經多年的冷戰和在阿富汗長期的戰鬥，軍隊和聖戰團體已經成為纏結一起的合作關係。只有在軍事統治之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才得以在巴基斯坦壯大起來。軍事獨裁將軍資亞（Zia）剝奪了宗教少數派的權利，和制定Shariat法。當普通巴基斯坦人一有機會，他們就以壓倒的優勢投票反對原教旨主義——右翼宗教政黨從來沒有得到百分之七以上的選票。

在巴基斯坦流行的伊斯蘭傳統是世俗的和寬容的——和關乎毛拉正統權利的高度懷疑。那是為什麼這些聖團和他們的教父在喀什米爾的問題上，在軍隊中得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亞爾·里赫曼，巴基斯坦人權委員會主任，向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在喀什米爾的「難民收容所」號召：印巴戰爭越加溫，伊斯蘭權力越強大。穆沙拉夫能夠調整強硬路線，這是可信的，也有可能他會直率地撕下世俗的面具，軍事統治的時間越長，巴基斯坦的塔里班化的危險越大。

工人階級反對軍事政變的現狀如何？

到現在為止，在巴基斯坦底層的人民一直沉寂無聲——那不是對軍事政變的錯誤認可。獨裁政治和平民政治家們淒慘的失敗，已使人民筋疲力盡。大多數的行業聯盟的領袖，對軍事統治只作出最小心的批評。就那樣，使知識分子完全迷失了方向。但是我與他們談話的活動分子卻十分清楚軍方在巴基斯坦人民身上的打算是邪惡的，而且他們自己正在準備作長期的鬥爭。已經有了抵抗的信號——抗議失業和私有化——而婦女運動肯定不示弱。在左派當中有一些暫時性的重新組合。在卡拉奇的抗議失業中，軍隊和警察用警棍對付遊行示威，逮捕了政治領袖。如你所說的下層的巴基斯坦人有鬥爭的傳統，那就肯定會在將來再次顯露出來。我想軍方的回應會是極端殘忍的。這個時期，不管怎樣，這個政權缺少一種冷戰的防護作用，和來自國際的團結運動的，將會更加強易受責難的壓力。那麼，我們不得不在此也要作好準備。

由於巴基斯坦在軍事統治之下和印度中一個印度沙文主義組織BJP所領導，一般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怎樣反應呢？

撇開來自古巴導彈危機的可能性，我們沒有比現在更為接近核戰爭了。在1999年夏季卡吉爾衝突之前，在兩個核武器國家之間，從來沒有常規的重要陸空戰鬥，並且在軍事政變之前，核武器國家是平民法治的，今天在巴基斯坦就不是這樣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在印度邊界的這邊，曾經是平民的政治家，他們卻是好戰的，總理瓦賈（Vajpayee）曾經重申，警告巴基斯坦不要指望印度以核武器「防衛自己」之前等著被攻擊。眼前的軍事獨裁，跨越邊界去加強印度的右派；而印度好戰的言論又加強了伊斯蘭軍事獨裁中的右翼。

我的印象是：壓倒大多數的巴基斯坦人要求同印度建立正常化的關係，和協商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在印度的形勢更壞。反巴基斯坦和反穆斯林的情緒，現在在精英中佔優勢，而且已經滲透到人口中的大部份了。不過，在印度有一股反對核武器的運動正在增長。一個社會活動分子聯盟、行業工會會員和知識分子正在進行鬥爭，反對印度的核武器路線，並聯合巴基斯坦志同道合的人民，有希望從下而來的挑戰能夠制止核戰爭的發動。

（楊萍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4月號）

德黑蘭的攤牌？

阿斯曼

伊朗的選舉勝利後，改良主義者能拯救伊朗的工人嗎？

龐大的動員，改革的情緒，高漲的期望：這些就是伊朗二月間選舉的主要特色，為改良主義的候選人拉到了壓倒的選票，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是新的。在1997年，自從改良主義者莫罕默德·卡塔米以壓倒優勢競選總統，這種情況也曾一度出現。

自卡塔米競選以來，要求改革政體和不要求改革這兩部份人之間曾有過非常激烈的鬥爭。保守派以阿里·卡曼尼為首。在1989年霍梅尼死後，他繼承了伊朗最高領袖的位置。他控制了武裝部隊、情報部、法制機關和國家廣播部。此外，卡曼尼的同盟者聖職人員控制著巨大的國家機構，即本約德（Bunyods），它們又控制著全部伊朗經濟的幾家公司。例如這個最大的本約德是本約德·穆斯塔沙泛，它擁有120億美元的預算，為首的是莫喀申·拉菲克達斯特，卡曼尼的親友。

本約德的控制給予部份聖職人員強有力的理由去封鎖像私有化這樣的改革，並尋求限制自由化貿易和投資的努力。保守派的每一個嘗試都想要抵消改良主義者強化的改革情緒。

因此，當受歡迎的改良主義者、德黑蘭市長被保守派於1998年推上法庭受審判的時候，成千上萬的支持他的伊朗人，都坐在全城的咖啡店裡觀看電視審判進程。

暗殺領導持不同政見者的四個知識份子也在1995年在德黑蘭引起暴行——因為找不到他們的兇手，這件事被認為與情報部有聯繫。當去年夏季學生在德黑蘭大學抗議一家自由開明的報館被封閉的時候，受到保安武裝和右翼穆斯林暴徒的攻擊，從而爆發全國性的憤怒學生示威運動，並且蔓延到一些工人階級的地區，保守派仍然企圖使改良主義的浪潮在選舉的高潮中停止。把贊成改革的聖職人員投進監獄，關閉更多的報館，取消贊成改革的候選人的資格，攻擊贊成改革的同盟者：——所有這些都失敗了，並且繼續討論未來的共和政體、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民族的和宗教的少數派地位。

改良主義者能滿足人民的期望到什麼程度？這裡的情況很不穩定。改良主義者不是一個首尾一致的統一體。他們是在18個不同的政黨、專業協會、神職組織和學生的、婦女小組選舉出來的聯盟之下運作的。改良聯盟佔支配地位的那部份是從舊政體中來的，例

如卡塔米是一個中層牧師、是前文化部長，他受到部份聖職人員、國家官僚中的成員和專業人員的支持。

改良主義者為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自由、言論自由和社會正義而鬥爭。但是他們希望用民主改革的方法去打破保守派掌握國家和經濟命脈的大權。

在聯盟內佔支配地位的成員非常通曉經濟計劃，他們需要更多的市場，更多地拆除國家控制的那部份經濟，更多的私有化和削減國家的補助金。他們也要改善同西方的政治關係，以便吸引外國資本來幫助沉重地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儲備負擔大量債務償付的經濟而使它多樣化。

事實上，改良主義者的領導層需要強化的許多措施，是由前總統拉夫桑賈尼介紹的。他帶著一大批專家治國論者到國內的公用事業部份，他鼓吹把低效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休克療法。不管怎樣，拉夫桑賈尼的改革失敗了。他現在廣失信譽，而只有設法躋身於國會之中，訴諸選舉來決定。在改良主義者聯盟內的其他小組，較少地熱心於市場而與強有力的國家部份有較多的聯繫，也包含有較為激進的小組，像作家協會、婦女小組和學生組織。特別是對卡塔米感到憤怒的學生；去年，當卡塔米反對他們的抗議運動時，那種令人恐怖的規模就像保守派那樣厲害。

在改良主義陣營中的爭論已經夠劇烈了。像這樣的情況今後將要更甚。聯盟的領袖們曾經表態，要求改革謹慎地進行，並且希望能與保守派一起工作。在選舉之後不久，企圖中傷改良主義者的領袖們像顯露出來的那樣，這是不容易的。總統的一個兄弟，新聯盟的領導人之一說：「總統努力打開已被封閉的道路，應該忍耐地完成，有時候要保持緘默。」卡塔米容許新的國會「不能做人民要做的每一件事。」

這樣，總統和新的改良主義者的國會所面對的，不僅是來自老保守主義者的可能抵抗，而且面對在它自己的支持者中日益增長的不滿。在工人中已經有了不滿的信號。在二月發生了示威，反對從勞工法中豁免小工廠的一條法例，根據這條新法例，給予僱主更多的權力去對付有病的工人，並停付工資。這個衝突，在改良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在改良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的期望之間，是一場發生在全伊朗社會爭論的、強化的衝突，而且是來自學生工人滿懷希望的抗議。

（楊萍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4月號）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內望

庫爾馬諾夫

〔庫爾馬諾夫是哈薩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書記，也是哈薩克工業重鎮的工人領袖，此外又是「爭取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成員。1997年秋天，哈薩克礦工遊行到阿拉木圖示威抗議，爭取欠薪，庫爾馬諾夫是該次鬥爭的領袖之一。在那次行動裡，他及另一名工人被捕下獄，那位工人後來死在環境惡劣的獄中。本文譯自庫爾馬諾夫在第五屆托洛茨基國際會議上提交的報告摘要〕

哈薩克的資本主義復辟進程和另一位講者瓊斯所描述的，與俄國地區的復辟進程無大差異。繼1991年的計劃破產後，納扎爾巴耶夫政權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重整，這個經濟重整又因納扎爾巴耶夫政權極之貪婪的性質而變本加厲（霍道尼按：納扎爾巴耶夫是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哈薩克共和國的現任總統，又是前哈薩克共產黨的首腦，其經濟政策及落實的方法與前印尼獨裁者蘇哈圖十分雷同）。

納扎爾巴耶夫的「拼命私有化」政策是由國際貨幣基金會和「重建及發展歐洲銀行」這兩個國際機構所主導，其政策重點落在開發原始物資，以出口到世界市場為導向。與此同時，那些列於製造貨品的經濟部門如機械製作、金屬製作等重工業，卻被毀滅。共和國有超過200家最大的企業，包括石油、天然氣和其他煉造業，以低微的實際價值落入了外國大公司的手裡。例如在前蘇聯列入於最龐大的、擁有30種企業合僱6萬工人的一個綜合工業村，便用1百萬美元的區區之數，出售予一間英資公司。至於向共和國昔日的首府阿拉木圖供應電力的系統，原價值數十億美元，卻給比利時一間公司以5百萬美元購買去了。

現在，國際跨國公司擁有了哈薩克實際上的所有經濟領域；從電力到通訊到採礦業。可是，在整個地區上，也同時出現了解除工業化的過程。例如，哈薩克原有60多個圍繞著礦業各種操作而崛起的小城市，這些城市現在都落入沒落衰敗的過程。整個哈薩克地區都變成了非工業化。在礦產資源豐沛的土地上，人民普遍沒有電燈、天然油和暖氣，並且得要在戶外生篝火煮食。

根據協定，跨國公司應該把所得的部份利潤繳付給國家，以作為國家的財政開支預算。但這些跨國公司運用了瞞稅的技倆：用低價將產品出售給由它們自

己開設的離岸公司，所以上繳的稅款少之又少。至於那些離岸公司，轉個彎又以高昂得多的價格把產品出售給世界市場。結果是國家損失了以數十億元計的收入。

現在的哈薩克是由跨國公司和國際貸款銀行把持著經濟。比起強大的跨國公司，民族資產階級是微不足道，並且是封妻蔭子的那種，都是納扎爾巴耶夫其人其家屬及同夥。

政府的施政令哈薩克的人口大幅下降，從1990年的1.7千萬人劇降到1995年的1.45千萬人。據國家統計委員會的估計，全國有6成人口甚至沒有維持生命的最低收入。而據一項獨立的社會學調查研究所得，這個比率更高達9成。在失業的數字方面，並沒有可靠的數據，但估計失業人數會是高至5百萬。在1990年，有7.6百萬人在各種不同工業裡工作；到了1997年，只有3.6百萬人仍然受僱用。所以，在過去那幾年間，一共損失了4百萬個產業職位。

哈薩克的經濟改革令俄國望塵莫及。反勞工的法例一再引入。在危險度高的產業，工人平均的壽命只有55歲，但新的法例把該業的退休年齡調高至63歲。教育改革把原有的免費中學科技教育及免費的大學科技教育取消。各類社群服務私有化，從而是大幅提高收費，令大部份工人無法應付。政府現在正在修訂法例讓土地私有化，這樣一來，就是給外國公司併侵土地而鋪路。

總括來說，哈薩克目前是正在按照拉丁美洲或非洲的模式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這種模式是完全依賴世界市場和跨國公司。我們的任務是把被改革大幅削弱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歷久常新：革命及社會主義的思想，將會在工人和青年人間找到廣泛的聽眾。

在哈薩克，民族資產階級是十分之薄弱，無法組織它自身的政黨。這種局面印證了托洛茨基的命題，即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是全世界落後國家的唯一出路。哈薩克的經驗展現了托洛茨基的綜合及不平衡發展論的正確性，而且也展現了在一個資本主義無法為深重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落後國家裡，綜合及不平衡發展論是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史丹譯自《第五屆托洛茨基國際會議報告》）

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第一時期的終結

馬列維斯基

人們普遍渴望「正常」及把車臣打敗，毫無疑問是令普京當選的眾多因素之一。俄羅斯工人活在驟然而來的商品化的環境下，面對著不停的通貨膨脹、工資萎縮，並且在資本主義復辟起步之際所帶動的變化的掣肘下，受到種種不可理解的變動支配著日常的生活，工人是迷失方向了。所以大部份工人嚮往「正常」，換言之，就是結束把他們弄得暈頭轉向的不停的變動。普京的強國論述，就此得到許多受落者。

由油價遽增3倍和把盧布大幅貶值所開啓的經濟上揚（俄羅斯是石油出口國），令俄羅斯的工業在去年增產了8%，使全國生產總值增長了3%。這是繼蘇聯倒台後，全國的生產總值首次有所增長。這令普京政府多了周旋餘地，並且令工人對普京寄以厚望，希望從此有機會獲得發回工資和退休金，而政府能夠順利得到稅收，以確保最基本的服務運作。

俄羅斯的官僚編制階層是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才得以把個人漁利的社會特權正常化，這和東歐（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但不是東德）大為不同。東歐自1950年代便漸進地引入私有財產，這使該處的官僚階層能夠有社會適應的過程，並且刺激「私人能動性」。俄羅斯的新生資產階級便沒有這個長達30年的、從「小型商品生產」式的學徒制中壯大過來的便利。

官僚的資產階級化過程

當俄國官僚的領導層一旦明白到，他們不可能在沒有波蘭式的民眾興起的威脅下「長此以往地繼續下去」，官僚便在沒有一套長線的成熟計策，沒有任何過渡性的措施之下，在商品的慣性思維仍沒有植根社會之際，遽然地行動起來。代表官僚大多數的領導層一下子實施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衝擊療法」，用推行極端的自由市場來取代戈爾巴喬夫的半吊子措施。這一套「衝擊療法」運用到波蘭和匈牙利時，沒有引起該處工人的重大反對。

所謂「衝擊療法」，實際是國家行政在生產領域

方面粗暴地撤退，任由有能力割取民脂民膏的官僚層份子為所欲為，在實質上是把資產分配給他們。所有這些掠奪行為，是在大吹大擂民主的名義之下進行。

不過，有助於官僚進行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的不干預政策，到現在卻成為了他們擴大不義之財的掣肘。所以，最初聲稱反對國家干預的人，現在都希望國家管制的法網的保護罩下運作。俄羅斯新生的資本主義希望確立自身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它希望在國家的保護罩下來達到這個目的。

普京的議論是反應新生資產階級所渴望的穩定性而發出的。他說：「國家愈強大，個人愈自由。」又說：「國家唯其強大和富有效率，才能保障企業、個人和社會的自由。」普京的競選對手、主張極端自由主義的亞夫寧斯基（此人由莫斯科新生的資產階級所支持，在全國得票6%，在莫斯科得票19%，遠遠落後於普京所得的46%）所目睹的，就是俄羅斯新興的佔支配地位的階級希望開啓新一章的意欲。

3月26日的選舉令普京之作為俄羅斯國家的首腦合法化，並且標示了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個時期的終結。也就是說，結束了官僚階層在私有法的名目下，無法無天地在沒有法理根據下分配社會物資的原始累積時期的終結。

資本主義復辟第一時期的終結

吞佔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款項的醜聞令葉利欽一蹶不振（普京盡其所能掩飾這宗醜聞）；這宗醜聞象徵了一個時期的終結。同樣的，也結束了黑社會搶掠企業資產的時期——這些資產被那些前身是官僚階層的人霸佔，他們並且以為就此便確定無誤地成為了俄羅斯新生資產階級的一份子。

俄國寡頭集團的內部現在渴望穩定和安全，而就是國際資本也是這樣希望。在這之前，國際資本為恐怕投資會被掠奪成風的社會風氣所吞沒，所以不敢放手投資到俄羅斯。

潰不成軍的工人階級現在對由官僚構成的俄國資

產階級不會構成威脅。威脅來自於在地方上壯大的地方政府官僚。這批人並沒有干脆完全變為靠恫嚇搶掠行事的黑社會，但他們也想掙扎求存，門徑就是吞佔地方稅收，結果是富饒的俄國亞細亞地區的資本無從發展開來。

普京現在毋須對付不構成威脅的工人階級；他對付的對象是地方政府。他宣佈要加緊對地方和各個共和國（共有88個）的中央控制。俄國對車臣的殘暴戰事表明，普京準備用極端手法來限制共和國的自治要求。

在普京的辦公廳裡掛有俄國彼得大帝的圖像。普京口口聲稱的「俄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不僅是指由彼得大帝所代表的強國傳統，他尤指俄國要建成立成爲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強國」、「一個融入世界經濟體的俄國」。而這個「融入世界經濟體的俄國」，普京和俄羅斯政府所意欲的並不是從屬性的地位，他們是要重新成爲一個強大的霸權。俄羅斯政府在10年混亂之後，現在於軍隊、情治機關、政治警察及外交方面的重新振作，表明了它要重新成爲強國的意欲。此所以，俄國現在謀求各個邊界的看管防治，先是在亞洲（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的衝突在在威脅到俄國邊疆），繼而在巴爾幹地區。若有可能的話，俄國有意思參與「西方俱樂部」——「北約」，作爲它的一份子看管邊關；否則的話，也不惜

與「北約」對立。普京希望在沙皇而非紅軍的傳統下，讓資本在俄羅斯暢所活動。

俄國欲行強國路線

正是俄羅斯的新當權階級本身的薄弱，令它授權給國家機器以讓後者自主其事；而且，也由於帝國主義的各個力量在冷戰結束後重新湧現衝突，所以讓俄國的資產階級官僚體產生希望，以爲能在世界當前的政治混亂中發揮自主的作用。

歐洲聯盟在里斯本舉行的高峰會議，向普京提供了機會，以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發展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戰略夥伴關係」。普京希望俄國的核子武器能讓強盛時代的俄國重新崛起。

普京以至俄羅斯新生的資產階級所持的世界觀，仍然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現代史觀那一套本子。對於他們來說，強國的力量是由能生產多少噸的煤鋼和石油所代表，是由強大陣容的軍隊、最高領袖的才能來代表。對於他們，資本是一宗巨大財富，並無所謂生產方式的矛盾可言。

俄羅斯的新領袖們希望當一個務實者而不是理論家，但即使這樣，他們所描述的世界其實是一個唯心的世界，而他們孜孜以求的宏圖大計，也就是這種理想化的果實。這使他們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5月號）

第五屆研究托洛茨基國際會議

霍道尼

「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委員會」第五屆國際會議，已於1999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完畢。這一次的會議主題，是有關托洛茨基著作在今日的貼切性。

據委員會的國際協調人總結報道，這次會議在10月29-30日於莫斯科舉行，約有80人出席。出席這一屆會議的人士，大部份來自俄國、烏克蘭和哈薩克；至於來自前蘇聯以外地區的人士，則較過去歷屆會議爲少。

不過，由前蘇聯地區內的學者和社會活躍分子所提交的報告，引起了十分熱烈的討論。這些報告的內容，結合著托洛茨基的觀點而對今日的諸問題作出嚴肅的探討，深入的反映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在今天的貼切性。

這次兩天會議共劃分爲3大討論議題，共有15篇論文提交討論，至於3大議題的總題，則是：《托洛茨基的世界——120年來的鬥爭》。第一天的會議在

俄國科學院舉行，分別就《左派反對派史和托洛茨基傳記》和《托洛茨基和民族問題》這兩個分題作出討論。第二天，會議移師到靠近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蘇郁斯酒店的會議廳舉行，論題是《資本主義的復辟過程與托洛茨基主義在今日的貼切性》。

以下介紹這屆會議的一些討論重點。

解體後的前蘇聯，今日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這兩大問題：民族問題和資本主義復辟。會議在這兩個題目上的討論和爭議，也是最為激烈。

蘇聯的民族問題在何時發生？

來自俄國科學院的政治經濟學家蘇敦·德扎拉索夫回應來自美國紐約的議題報告人霍道尼提交的論文《托洛茨基的戰時通訊：巴爾幹問題及1912-13年巴爾幹戰爭》，指稱托洛茨基自列寧死後，沒有在民族問題上與斯大林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鬥爭。德扎拉索夫並認為，儘管有著斯大林的沙文主義，但蘇聯時代就民族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和深刻的種種經驗表明，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成就。他更進一步指出：

「現行的各個政權是沒有能力找出一個真正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因為，必須要有一如蘇聯那種超民族的思想，才能夠把人民聯合起來。然而私有化所產生的階級，只是有興趣在其所屬的領土內擁有財富，此所以，〔前蘇聯的〕各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只會堅持『我的民族最優秀』。」德扎拉索夫作結論說：「只有在承認我們所有人都是相同而平等的國際主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解決民族問題。」

緊接著德扎拉索夫發言的是來自烏克蘭基輔的丹尼斯納克。他在回顧了布爾什維克對烏克蘭的政策，及列寧向斯大林的狹隘民族主義作鬥爭的歷史後，回應德扎拉索夫的論點。丹尼斯納克不同意後者的見解，他認為民族問題之所以在蘇聯倒台後才發展起來，並不能證明蘇聯在這方面的政策具有活力。他指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承認衝突不會是突然爆發開來，而卻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出來的。在1980年代末爆發的衝突，是經過了之前一段十分悠長的時間把忿懣積聚下來；而需要對此負上責任的，是在1930年代初在蘇聯取得勝利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這個政策從那個時候開始，無大變動的一直維持

到1980年代末。」

資本主義復辟

前蘇聯的「爭取工人國際委員會」的組織及托洛茨基國際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的羅布·瓊斯，就俄國的資本主義復辟進程提交報告。瓊斯認為，俄國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他表示，在蘇聯時期，國家經濟中有60-70%是依賴國營企業的生產。而時至今日，大部份的生產則主要是來自於採煉性的出口工業：石油、煤氣和其他天然資源。非生產性的工人仍然是掛名工人，從而不會喪失原有的社會福利，所以令勞動市場沒有發展開來。不過，價值規律確是在運作，發揮作用。

瓊斯解釋，在蘇聯時期，價值規律也在運作，但那時是用來量度生產的價值而非價格的價值；在當時，生產的價值是經過扭曲地被感受到的。至於在今日的俄國，價格確乎是接近世界的價格，而價值規律也不再扭曲。即使在盛行著以物換物的工業運作裡，計算以物換物的基礎，也是對應著所交換的商品的等價來換算的。

瓊斯的發言，得到了來自哈薩克的庫爾馬諾夫的共鳴。他在會議上也詳盡的介紹了這個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當前在資本主義復辟蹂躪下的慘狀（詳見另文）。

主催托洛茨基國際會議的「研究托洛茨基委員會」目前正在加緊進行《托洛茨基案件》的翻譯工作，並且已經接近完成。據委員會報告，這部從英譯俄的巨著已經進入校對的階段，預料在1年內可以付梓。刻下，委員會準備把托洛茨基論巴爾幹半島問題的文章集書出版。這方面的著作目前已經有微型電腦碟問世。此外，委員會的另一位成員沃耶科夫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托洛茨基研究所，以備在休會期間定期討論托氏的著作和見解。討論的成果將1年兩次結成文集出版。

委員會決定，第六屆國際會議將於2001年10月，在烏克蘭舉行。屆時，將會組織一次探訪托洛茨基出生地的一日遊。

（史丹摘譯自《第五屆托洛茨基會議報告》）

尋訪托洛茨基的出生地

霍道尼

〔有份參與訪尋托洛茨基出生地的奧拉克·維爾尼克介紹了這次訪尋的來龍去脈〕

引子

托洛茨基在烏克蘭出生。根據托氏的自傳《我的生平》記載，人們知道他確切的出生地點：在赫爾松州耶里沙韋格勒斯基區的亞諾夫卡村外圍的布龍施泰因莊園。所以，尋找他的出生地似乎是容易不過的了。「爭取工人國際委員會」在烏克蘭的分支「工人抵抗」組織遂擔起了尋找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出生地的工作。

我們在現代的烏克蘭地圖上試圖尋找這個人口區的時候，遇上了第一遭的出乎意料，在博布里涅茨地區內——托洛茨基提到他出生的所在地是在博布里涅茨鄉一帶——並無這個亞諾夫卡村。一個不那麼認真的搜尋者，或許就打探到此而已。但這麼一來，便會是大錯特錯了。

把革命前的一幅耶里沙韋格勒斯基區的地形勘測地圖來與一幅現代的軍事地圖平列對照之下，我們能毫不含糊的確定，在19世紀末的亞諾夫卡的地理位置，就和當代的基洛夫格勒州內的博布里涅茨地區裡的貝里斯拉夫卡壠區交疊。饒有意思的是，在這張古舊的檔案室留存的地圖副本上，留有一個烏克蘭中央RADA書記局的蓋章，並且有人在布龍施泰因莊園旁邊用鉛筆打了個記號。

一支訪尋小組於是在1998年8月動身，前往托洛茨基的出生地。

傳說流傳迄今

貝里斯拉夫卡壠區是個細小的壠區，只有60戶人家。所有村民都知道托洛茨基是在他們的村裡出生，並且把他視作本村人的一分子。由於這個地方經歷了一再遷移和開墾，而且現在居住其上的大多數人其實都是來自他處，所以這個事實尤為教人驚訝。在德國佔領期間，這個地區尤其多災多難。例如，就在鄰近的格羅莫爾村，它的全部43名猶太人口都被納粹槍殺了。時至今日，都沒有猶太人在這裡居住……村

裡大部份居民，都是老人。一個年青人都沒有。村裡細小的俱樂部會所緊緊關牢了3年。這個地方與外界隔絕，村民幾乎無報可讀——只有一週來兩次的地方報紙。

由於托洛茨基的父親是地區上相當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地主，所以布龍施泰因莊園裡有許多建築物。甚至時到今天，在本地區上的大部份建築物，都是由刻有「B」字的堅固泥磚砌建；這些「B」磚就是布龍施泰因磚工廠的標記。一名位於凱特里薩諾夫卡村的住客所住的房子的建築泥磚，就是取自托洛茨基出生地的那間房屋。這名住客還指天誓日的說，托洛茨基是在西班牙內戰中陣亡的哩……

有10名到15名居民，他們自認為對托洛茨基的生平和工作知之甚詳。在他們的協助下，小組人員找出了一些富有歷史性的建築物的地基，例如托洛茨基曾經就讀的學校所在地、托氏幼年住過的房子——他的父親的房子的殘餘。

在格羅莫爾村有一個古舊的猶太人墓園，墓地已經百草叢生，但我們還是找得出托洛茨基在1910年故世的母親安娜·里昂蒂耶芙娜的墓碑。墓碑除卻破開兩段之外，仍然完好。我們給墓碑拍照，把照片寄給「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委員會」去。順道說一說，法西斯主義者在1942年轟炸這個墓園，但無人知道理由何在……

有關托洛茨基的事跡，在這些村民間代代相傳；經過斯大林派在這許多年來的詛咒之後，托洛茨基的事跡奇蹟地得以保存下去。

我們所說的事跡，並不是那些英雄史。譬如，有一名1915年在亞諾夫卡村出生的婦人，繪聲繪影的向訪尋小組談到這段逸事：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偕同他的舅舅，是怎樣的把羊角縛到頭上，偷偷地潛水到他的姐妹們出浴的地方去。許多村民仍然記得這一幕：那些幾乎全身赤條條的少女們，給嚇得面無人色，邊走邊大喊說見到水怪……

當地居民說我們可以在他們的俱樂部會所舉行研究托洛茨基的會議。那個地點可以容納約150人。

（史丹譯自《第五屆研究托洛茨基國際會議報告》）

(讀後感)

真理在前進中

——《失去強制的烏托邦》一文讀後

田友



偶然在《上海文學》1999年第1期上，讀到一篇題為《失去強制的烏托邦》的文章，該文以●和▲分別表示兩位作者金雁和秦暉的意見，全文幾乎都是談托洛茨基、其思想及托派人士的境況的。秦暉的「開場白」說出他們談這些問題的導因：

「近來鄭超麟先生的去世，以及去世前他的幾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的發表（《鄭超麟回憶錄》、《懷舊集》及海外版的《憶尹寬》等）引起了國人對『托派』的強烈興趣。從他的書中人們看到了當年中國『托派』人士的悲劇人生與精神風貌。那麼，托派在今日世界上的境況又如何呢？」

金雁接著「先講點個人感受。1991年我在波蘭看了華沙電視台播放的多集文獻紀錄片《托洛茨基》，拍得頗具感染力。尤其是片中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後世界各地的群眾性哀悼場面，令觀者無不動容。關於托派的文獻我過去看過許多，但這次的視覺效果仍令人震動：真沒想到以極端主義小團體領袖和偏執的激進思想家形象出現的

托氏還有如此的感召力，更沒想到在素無托派傳統，而當時又正值劇變後不久，社會情緒的鐘擺趨於最「右」之際的波蘭，會播出這麼一部片子，而且產生了如此效果。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托洛茨基思想在當今俄國的影響。……劇變至今布哈林熱早已銷聲匿跡，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則明顯上升。今年（98年）10月7日反葉利欽大示威中為傳媒關注的口號之一就是：『普里馬科夫當心點，托洛茨基的子孫將把俄國引上另一條道路！』

托洛茨基主義「在蘇共20大揭露斯大林之後，在1968年西歐學潮、工潮期間，乃至在東歐劇變前後，它的影響曾三度上升。尤其是蘇東劇變後世界範圍內各種左派思想幾乎全面退潮，而托洛茨基主義幾乎是唯一未受影響還有所發展的。」

「普里馬科夫當心點，托洛茨基的子孫將把俄國引上另一條道路！」這個帶有警告性的口號，使人不由得想起二次大戰前夕，法國駐德大使去見希特勒，希特勒津津樂道在同斯大林簽訂

的《蘇德條約》中他得到的好處，並沾沾自喜地瞻望戰爭勝利的前景時，法國大使警告希特勒說：你以為自己是勝利者，但最後的勝利者會是托洛茨基。這真是歷史性的巧合。這是必然？抑或是偶然？當然，在二次大戰中，勝利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但這不妨礙這裡提到的巧合。

早在30時代，斯大林已經把蘇聯國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斬草除根地消滅乾淨了。即使是被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本人及他的親人，也難逃過斯大林派遣的特務的謀害。但，60年後的今天，竟然有「托洛茨基的子孫」要「把俄國引上另一條道路！」，這確實是斯大林那樣的人始料不及的。當然，這裡所說的「托洛茨基的子孫」指的不過是要奉行托洛茨基思想的新一代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家。

「托洛茨基的子孫」能把今日的俄國引上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俄國的傳媒沒有明說。這也如同那位法國大使對希特勒沒有明說托洛茨基的勝利是什麼樣的勝利一樣。但毫無疑問，雖然時間不同——相隔60年，人物不同，時代背景不同，而說者和聽者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所謂「托洛茨基的勝利」就是指革命的勝利。所謂「托洛茨基子孫引上的道路」，就是指革命的道路。而這裡所說的革命就是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亦即工人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革命。

儘管人們讀過不少托派文獻，但很難說是否真的了解了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和主張。人們至今還在指責「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也明確充斥著左得出奇的命題」，托派是「極左派」，是「極端主義的小團體」等等。儘管這些指責比指控托洛茨基、陳獨秀、托派為「間諜」、「特務」、「殺人犯」、「匪幫」、「漢奸」來，已大為不同，但這些指責畢竟仍然是斯大林辭典裡的陳詞濫調，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若要人們在提出這些指責時提供事實根據的話，那就會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到如下的話，什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就是「不要農民」，什麼托洛茨基反對派提出建設水電站，實行工業化的主張就是「要農民不要耕牛，而去買留聲機」之類的指責。但，這絕對不是什麼事實根據，而是受了斯大林一貫玩弄的歪曲、誣陷、偽造、栽贓的技倆所影響的。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代表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兩個人真是冤家死對頭，彼此絕不相容。但這並不是個人之間有什麼不解的冤仇，也不是

什麼個性的衝突；而是代表兩種不同社會集團或社會階級的利益首先反映在思想上理論上的矛盾，即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的對立和矛盾。這一對矛盾及其鬥爭，從20年代起貫串了整個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列寧死後由斯大林扭曲建造的蘇聯這座大廈，它的理論基礎就是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座大廈的門口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到處貼滿了「社會主義」的標誌。斯大林把他的一言一行，他所推行的國內政策和國外政策，都用「社會主義」來包裝。在長長的幾十年中，在蘇聯幾乎絕少有人敢懷疑和指出斯大林的所作所為：而托洛茨基和托派卻敢於揭穿斯大林的欺騙性，指出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錯誤，他所建設的蘇聯並非社會主義天堂，而是實行歷史上少有的野蠻和暴虐的官僚專政。這個國家雖然由於十月革命而脫離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鎖鍊，但它自身卻充滿解不脫的矛盾，特別是蘇維埃官僚集團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窒息了這個國家。它的前途要嗎是工人階級推倒官僚集團的統治，在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亦即無產階級民主下，走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正途；要嗎就會在官僚集團的統治下陷入資本主義復辟的深淵。

6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還祇是一瞬間。但這60年，蘇聯和世界的變化卻使人瞠目結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蘇聯瓦解了。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突變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早就散了夥，它的成員爭先恐後地要鑽入帝國主義者那個「反蘇反共」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去。這些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在推行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這些改革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只差還沒有在莊嚴的憲法上寫上：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樣的詞句。

但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命運，過去和現在都不是祇由佔據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來決定的。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過去反對斯大林官僚集團，今天仍然在反對後斯大林主義的新官僚統治集團。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並不願意回到資本家地主階級統治的時代去。托洛茨基主義影響的發展，正體現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堅持要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事實勝於雄辯。幾十年來階級鬥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鬥爭體現了工人

階級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托洛茨基的主張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被蘇東巨變證明是錯誤的。真理戰勝謬誤。這就是歷史的裁決！

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假社會主義迅速崩解，斯大林主義徹底破產面前，在托洛茨基主義在群眾反對官僚集團統治的鬥爭中獲得發展的面前，那些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卻給搞不清楚了。他們分不清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區別，分不清斯大林的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區別。當然更難懂得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不斷革命論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鬥爭的重大歷史意義了。人們談論什麼「強制的烏托邦」、「失去強制的烏托邦」，什麼「低調的理想主義」、「高調的理想主義」，什麼「無強制的烏托邦」和「強制的現實主義」等等。用這些「概念」把斯大林的假社會主義視為「烏托邦」，也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視為「烏托邦」，把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視為「理想主義」，也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視為理想主義。

他們似乎認為，不管是斯大林，是托洛茨基，都是「烏托邦」，都是「理想主義」。他們之間祇有「強制」和「不強制」、「低調」和「高調」之分。人們並不追問斯大林是怎樣背叛了十月革命，篡奪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權力，殺害了一整代布爾什維克，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優秀份子。

不過，該文作者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的「強制」手段是有所批評的。秦暉指出：「理想過於『高調』會使其難以實現，但『難以實現』不等於造成災難。而強制才是真正的災難之源。……站在某種意識形態的立場上可以力求避免烏托邦而達至意識形態理想的實現，但站在超越意識形態的立場上我們首先要避免強制而消彌那不管以什麼『主義』為口實的災禍。」

金雁則具體說出這種「強制」所造成的「災難」事例：

「過去社會主義各國都把托派稱為『托洛茨基匪幫』，指其犯了種種可怕罪行。蘇聯說他們是西方間諜、暗殺集團，中國說他們是『漢奸』，領了日本人的錢來破壞抗戰。如今在俄國，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究竟誰搞暗殺已不是個問題，而在中國，今天誰還相信陳獨秀、鄭超麟這樣的人是『漢奸』？……斯大林都搞出了『古拉格群島』……。在中國的『左』史上我們聽到過許多『無不同政見者』，被借『信仰』之名以

營私的政治流氓冤殺的故事。」

而對於「不強制」的「第四國際」及所屬各國黨的評價，則認為：

「在意識形態上是比共產國際還『左』的革命黨，但黨務上卻是議會傳統下的社會民主黨色彩，一直堅持『黨內民主』，派系紛出。……以致於一直流為社會邊緣狀態的一小撮理想主義的獨行俠。」（金雁）

「中國托派也是這樣，陳獨秀、鄭超麟這樣的人物堪稱信仰純、意志堅，……其中人與人的關係倒十分『君子化』，從未發生斯大林主義組織那種不擇手段的自相殘殺與血腥內鬥，但要說作為，就實在談不上了。」（秦暉）

「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它們較少背上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包袱，直至今日仍能作為民間力量，在當今民主社會中承擔某種社會批判功能。而像鄭超麟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在當今斯大林主義隊伍中還有幾人？」（金雁）

事實上，斯大林不僅對托洛茨基及其同志肆意污蔑、迫害，而且「古拉格群島」、監獄、集中營、勞改營囚禁著千千萬萬無辜的人民。這一切都是歷史寫下的血跡斑斑的事實，絕不是什麼「烏托邦」，什麼「理想主義」。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新舊官僚集團的統治，是爭取自身解放的實實際際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是總結這個鬥爭經驗的科學，絕不是什麼「烏托邦」。

早在30年代末，托洛茨基就曾說過，某些知識界的人對斯大林的厭惡，會轉變成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反對。這真是先見之明。這樣的事例時常都可見到。

儘管社會的發展多麼曲折和難以預測，但社會要朝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卻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資產階級，不管是「民主」的、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的，都一致地要撲滅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星火。舊的和新的斯大林主義者也費盡心機，動用強大的專政力量，消滅了一代又一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一切終究阻擋不了一代又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湧現和成長。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據，說明真理是不可戰勝的。

歷史在前進中！真理在前進中！

1999年5月1日

〔編者按：關於托洛茨基主義是否「烏托邦」等問題，請參見本刊這幾期的有關文章的論述。〕

《先知三部曲》評介

馬騰雲

(二)

在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之前，全體中央委員會以及資深的代表於5月22日集會。克魯普斯卡婭在會上宣讀了列寧遺囑。遺囑嚴厲批評了斯大林，並要撤去斯大林總書記職務。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搭救他，說錯誤並不嚴重，斯大林已改正了錯誤，說服同志們，不要把斯大林撤去總書記職務。眾人都看著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一言不發。於是列寧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未被採納。托洛茨基又一次錯過時機，不利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這次錯過時機以後就再沒有可能使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了。

由於沒有接納列寧撤消斯大林總書記的建議，列寧遺囑就不能公佈了。儘管克魯普斯卡婭提出抗議，中央委員會仍然以多數票通過，將遺囑扣押下來不予公佈。斯大林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幫助之下，逃過了這次險峻的難關。斯大林再次得救了。

5月間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整個大會是譴責托洛茨基，咒罵托洛茨基。在幾個月前季諾維也夫提出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甚至逮捕他。在這次大會上，他要托洛茨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要一個黨員改變觀點、繳械投降是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後來斯大林也用這個方法來對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聯合反對派）。

「托洛茨基只為自己辯護了一次。他的發言平靜而有說服力。他含蓄地承認失敗，但他堅決拒絕收回他的任何批評……他的一切批評都是根據政治局關於新方針的決議，並且他說過的和寫過的一切沒有不是他的政敵們用這樣或那樣方式說過或寫過的」。「在他那充滿巧妙推理、犀利論據和動人呼籲的發言中，這些話以其極度質樸和堅定不屈而顯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靜和克制激怒了黨的書記們。服從而又不服從，遵守紀律而不忤悔，反而更冒犯了他們。」（《先知》，第2卷第152頁及153頁）。

1924年，軍事人民委員部的領導權，一點一點地從托洛茨基的手中失去了。三駕馬車通過伏龍芝和溫什利赫特逐漸控制軍隊的全體政治委員。在召開全國政治委員代表會議上，通過了解除托洛茨基軍事人民委員部主席職務。

所有的宣傳機構開展一個宣傳運動，「使全黨都能了解……從1903年開始直到《十月革命的教訓》為止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布爾什維克性質」。同時，要使全體人民及黨員都知道，托洛茨基對工農聯盟的危險性。卻不容許托洛茨基進行申辯。這就使人民群眾單方面錯誤的理解托洛茨基一向是反布爾什維克，是反對工農聯盟的。

「就這樣，帶著被塗滿恥辱的一世英名，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叫罵聲，甚至不許自己申辯，他離開了他在漫長而又關鍵的7年裡所領導的軍事人民委員部和蘇聯紅軍。」（《先知》第2卷第178頁）

1925年4月三駕馬車開始出現裂痕。斯大林提出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反對。夏天谷物上交未達到預定的數量，城鎮糧食短缺，糧價上漲。布哈林要向農民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布哈林向農民號召「發財吧」！他堅持要取消對農業資本積累的限制。列寧格勒人憤怒的反對布哈林對富農的庇護。列寧格勒黨人要求黨向貧農呼籲去反富農，而斯大林則堅決制止在農村中發動階級鬥爭。

於是，因為這些問題三駕馬車分裂了。斯大林與布哈林、李可夫聯合反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尋求與托洛茨基結盟。托洛茨基早就主張向富農徵收重稅，貧農和中農免稅的農村政策。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早就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內容之一。

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斯大林又施展他那總書記人事安排的權力，悄悄地把加米涅夫在莫斯科黨委員會裡的人員撤換，用斯大林、布哈林可靠

的支持者代替。在列寧格勒，斯大林一時無法更換季諾維也夫的人。10月到2月間，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展開鏖戰。

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兩派都拉攏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說好話。托洛茨基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靜觀兩派的爭論，並不表示態度。他覺得列寧格勒人的發言所說的是托洛茨基早已說過的，早已批評過的對富農的右傾政策。

斯大林操縱十四大。1926年初列寧格勒反對派被粉碎了。列寧格勒人不得不服從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是等於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員會挑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並不打算這樣幹。

直到1926年4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托洛茨基私下會晤。「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晤，充滿著內心的反省，驚人的忏悔、悔恨與欣慰的嘆息、預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滿希望的計劃」。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描繪斯大林的狡詐、剛愎自用和殘酷。「他們堅持認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沒有幹掉托洛茨基僅僅是因為害怕一些年輕狂熱的托洛茨基派成員進行報復。」（《先知》第2卷，第288頁、289頁）。

此時，托洛茨基才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但是已經太遲了。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充滿不切實的幻想。他們認為只要三人團結起來，就足以喚起布爾什維克的激情，引導黨回到正確的道路來。「托洛茨基搖搖頭，他對他們的樂觀情緒很不以為然。他比他們更了解失敗的滋味。這些年來當黨的機關開足馬力反對他，把他趕下野的時候，他已感到了它的全部重量。「官僚集團的墮落，黨機關後面舊俄尚未被驅走的深不可測的野蠻。他還擔心他的新的盟友的反復無常和不負責任。他無法忘記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寬恕了他們，而且盡量鼓舞他們去進行一場長期而又艱苦的鬥爭的意志」。（《先知》，2卷第290-291頁）

1926年7月14日聯合反對派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托洛茨基宣讀了聯合反對派的政治聲明。他們宣佈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把黨從其「機關」的暴君手中解放出來，爭取恢復黨內民主。他們要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富農，反對新經濟政策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官僚集團。當前迫切的要

求是提高產業工人工資。進行稅制改革，減輕貧苦人的負擔，對資產階級按照利潤交付高額稅，對貧農和30%-40%小土地所有者免稅，其餘農民繳交累進稅，提高對富農的稅率50%。發行強制性的糧食公債。實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逐步的集體化。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綜合的具體的五年計劃甚至八年計劃。

聯合反對派的聲明引起激烈的爭論。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的要求；拒絕豁免貧農納稅、加重其他農民的稅率，並抵制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斯大林指控反對派領袖在黨進行派別活動，是違反黨禁止派別的規定。他指責季諾維也夫濫用共產國際主席的職權，從自己總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舉行秘密集會。中央委員會決定把反對派的奧索夫斯基開除出黨，把拉舍維奇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軍事人民委員部，免去季諾維也夫政治局委員職務。

聯合反對派在第一次交火中就遭受到慘重的失敗。

聯合反對派無法衝破斯大林所控制的中央會議，他們只有向下層黨員、工人群眾宣傳反對派的政綱，以便取得基層黨員、工人群眾的支持，而向中央施加壓力。1926年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指示他們的支持者，要使全黨知道他們的政治、經濟的主張，散發政治聲明、傳單和提綱。反對派領袖們親自下工廠和車間向群眾演講。「黨的機關跑在了他們的前頭。它的奸細、狂熱分子和挑釁者到處用嘲弄輕蔑迎接他們，用可怕的嘈雜聲音淹沒他們的演講；恐嚇群眾，破壞會場，使群眾根本聽不清演講者的話。托洛茨基發現自己面對群眾束手無策，這還是30年來的第一次……面對辱罵鼓噪、偏執的噓聲起哄，他那出類拔萃的辯才，天賦非凡的說服力和高亢洪亮的聲音都無用武之地了，而其他的演講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顯然，反對派第一次同心協力訴諸黨內輿論的行動遭到失敗。」（《先知》第2卷第307頁）

反對派指責斯大林煽起反對他們的人都是流氓無產者及暴徒、無賴，他們不能容忍正直的黨員群眾接受反對派的觀點。斯大林為了破壞反對派向群眾宣講反對派的主張，是什麼手段也使用得出來的。不過，這並不能充份解釋反對派的屈辱遭遇。「這批流氓無

賴之所以能夠破壞大型集會，是因為多數人即使不是贊成他們這樣做，起碼也是漠不關心」。如果群眾有熱情於聽反對派的演講，他們會制止搗亂分子搗亂，維持會場秩序。可是，「在那些流氓無賴及其噓聲的背後站著的是沉默的人群，他們是那樣馴服和冷淡，……歸根到底，正是基層群眾的麻木使反對派遭到了慘敗。」（《先知》第2卷307-308頁）

為什麼工人群眾這麼麻木、冷淡？多依徹解釋這種現象是由於工業戰線上的數百萬新工人主要是來自農村。他們把農村的文盲、馴順和宿命論帶到了工廠居民區。工業生產機制很快改變了他們，使他們習慣於工業的節奏和紀律，把黨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號牢牢刻在他們的頭腦中，他們沒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抗議。在工人階級中仍存在有十月革命那一代幸存者和20年代培養出來的年輕工人，不滿意農民個人主義對企業的侵襲，不屑於為工資及形形色色的物質獎勵而進行鬥爭，但這些人只是少數。國家把那些有教養、精力充沛的優秀工人調到管理機構和行政部門工作，失去精華的工人階級不斷分裂。（《先知》第2卷116-118）

反對派向基層黨員群眾、向工人群眾呼籲遭受到失敗，也就最後決定了反對派不可能取得勝利，終歸失敗的形勢。

及後，斯大林揮舞大棒，把反對派一個一個打下去。把托洛茨基趕出政治局，取消中央委員職務，到最後開除出黨，流放，驅逐出國，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砍死。

在托洛茨基與斯大林長期的搏鬥中，最後，斯大林勝利了，斯大林是醜惡的勝利者；托洛茨基是失敗了，托洛茨基是閃耀著熠熠光輝的失敗者。

* * * *

作者對事件的議論，對人物的評論佔了本書很大的份量，那些議論有許多真知灼見；對人物的評論更是入木三分。但也有個別的問題不見得作者的意見是正確的。順手拈來數個問題，分述於下。

作者說「托洛茨基態度傲慢，獨斷專行」。（《先知》第1卷第377頁）。對托洛茨基這個評論是不恰當的。托洛茨基對人的態度雖然沒有「和藹可親」，也並沒有「驕傲自滿」的傲慢態度，更沒有「盛氣凌人」的傲慢態度。至於說到「獨斷專行」，

更是不合事實。作者沒有舉出任何一個實際的事實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獨斷專行」就是沒有民主，不經過民主討論、民主決定而「獨斷專行」。這個與作者多處說到托洛茨基要求黨內民主、要求無產階級民主，要求民主集中制是相矛盾的。

作者沒有舉出實際的事例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是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乘坐鐵甲列車奔走於各個戰場指揮作戰的時期。對每個戰役的作戰計劃、戰鬥的佈置不可能召集全體指揮員、政委來討論決定，尤其是當戰機緊迫的時候，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的。這種「獨斷專行」誰也不會去責備托洛茨基。但是重大的戰略決定，全局的軍事佈置和各條戰線高級指揮員的任免，托洛茨基則提出政治局作決定。他並沒有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權力來「獨斷專行」。

伏羅希洛夫等人攻擊托洛茨基最多的是托洛茨基槍殺共產黨員的指揮員。其實，被槍斃的只有一個共產黨員的司令員，他擅自率領部隊撤離陣地，造成不利的軍事形勢，被交由軍事法庭審判，法庭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例只有一個，而且並不是托洛茨基「獨斷專行」槍斃他的。

1920年發生工會問題的爭論。進行爭論的是列寧為一方，托洛茨基為一方。這次爭論是十月革命後發生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爭論甚為激烈。這次爭論對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投下了陰影，對托洛茨基有重大的影響。後來，斯大林派等人借用列寧批評托洛茨基的話來攻擊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後來說：「不可否認，所謂工會問題爭論一度損害了我倆的關係」。又說：「在這場爭論的政治內容裡，現已被傾倒了這麼多的垃圾，因此，對於將來要搞清事實真相的歷史學家，我不會感到妒忌」。（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冊，第510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多依徹在第二卷的「前言」裡提及到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堆起一座垃圾山，作者寫這一本托洛茨基傳記就是要推倒這座垃圾山的。可是，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作者並沒有如托洛茨基所希望那樣去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對這個重要的爭論，並影響了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的爭論，作者只作了簡單的論說（第一卷547頁-558頁，第3卷的555頁），而

且完全沒有提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

工會問題的爭論，開始時，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改組工會而引發起來的。列寧參加爭論後，轉到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問題的爭論。工會成為國家機關是列寧製定的《黨綱》所規定的。歷次工會全國代表大會都遵照黨綱所規定而作決議工會國家機關化。列寧也曾多次說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話。托洛茨基是按照黨綱的規定，提出逐步實行工會國家機關化。而列寧改變了意見，反對工會進行國家機關化，即使是逐步進行也不應該。工會要成為國家機關，應在很遠的將來。爭論中列寧用了不少激烈的言詞批評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受到很大的屈辱。對於這些事情，多依徹並沒有提及到，並沒有把爭論的真實過程敘說出來，更沒有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詳見本刊總第188期開始刊登的劉丹青《蘇共黨內工會問題的爭論》）

後來列寧多次要托洛茨基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托洛茨基多次拒絕了。托洛茨基不願意當列寧的副手，和這次工會問題的爭論有密切的關係。

作者說，布爾什維克是篡權者（《先知》第2卷第11頁，12頁）。他說工人階級已經渙散了，布爾什維克就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來掌權，布爾什維克黨就是篡權者。

這樣的論斷是不正確的。布爾什維克黨組建政府，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授權的，是合法的，並不是從誰手上篡奪政權。經過三年內戰，優秀的工人都到前線去作戰，而補充到工廠工作的是農村來的農民，帶著農民意識的工人是成為戰後工人階級渙散的原因。但當農民進入工廠當工人時，不管他仍保有農民的意識還沒有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意識，作為階級的劃分，他們只能作為工人階級。而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黨員，布爾什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也就是工人階級執政，就不能說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了政權。至於後來斯大林凌駕於黨、蘇維埃、工人階級之上的獨裁政權，是另一個問題了，而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政權的問題了。

作者說：「必須強調的是，歸根到底，托洛茨基的力量與弱點都同樣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他的失敗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作為一種運動陷

入主要困境的一種縮影——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看法與階級鬥爭及革命實際進程之間的矛盾與脫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在「舊社會的生產力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所有制關係時，革命才會發生。」可是實際情況卻是無產階級革命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先知》第3卷第554-555頁）。

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發生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尖銳化的時候，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就是生產關係已不能容納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馬克思認為英國是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客觀條件，無產階級革命會在英國發生。但馬克思認為，不用等待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尖銳化到劇烈程度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比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法國及德國也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而且，馬克思估計無產階級革命首先開始於法國或德國（《黑格爾法哲學批評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頁；《機密通知》，全上，第16卷，第472頁；《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48年11月8日的信》全上，第36頁，第230-231頁）。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比不上1917年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法國和德國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俄國在1917年當然也能夠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並沒有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進程相脫節。

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40頁），即使是資本主義發達的英國。一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必須其他國家也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共產主義只有在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共產主義才能存在並能繼續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了，但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革命一個一個失敗了，沒有實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所以，托洛茨基的失敗並非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的失敗是由以上所說各種條件、各種因素匯合而成的，並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至於俄國革命取得勝利後，其他國家的革命沒有

成功；或者第二次大戰後，希臘、法國、意大利、印度尼西亞都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優越形勢，但沒有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都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而是領導的錯誤。

作者說：「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認為，官僚集團或它的一部份是資本主義復活的代理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團會變成新的有產階級的假說」。（《先知》，第3卷第330頁及331頁）

作者沒有活到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如果作者親眼看到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就會改寫上面這段話了。

斯大林官僚集團是寄生於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階層。他一方面為追求集團的利益而損害公有制；另一方面又要保護它的寄生體——公有制。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在蘇聯幾十年的歷史中，有時候保護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有時候損害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托洛茨基所說的「官僚集團是潛在的資本主義代理人」是沒有錯的。當到政治氣候適應於官僚集團向資本主義的追求時，官僚集團就會掙脫公有制度的束縛，甩開公有制這個寄生母體，復辟資本主義。蘇聯解體後我們已經看到各個宣佈獨立的共和國首腦人物都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原本官僚集團中的一員。

托洛茨基早就指出，蘇聯的前途不是向社會主義發展，就是走向資本主義。不幸應驗了資本主義的前途。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正如托洛茨基在五十多年前所預言的那樣：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產。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18-219頁，春燕出版社）。

本書雖然有上面指出一些錯誤、缺點和不足的地方，但從全書來看，依然是一本優秀的傳記作品。

多依徹的《先知》出版後，法國托洛茨基研究學者佩里·布魯耶花了三十多年時間寫了《托洛茨基傳》巨著，於1988年出版。第四國際活動家、政治經濟學教授厄爾奈斯特·曼德爾對多依徹和布魯耶這兩本托洛茨基傳記作出評論，他說，多依徹的《先知三部曲》是側重於評論和議論，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是作歷史的敘述。

希望中國翻譯界能早日把佩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翻譯成中文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從這本巨著中來加深認識托洛茨基這個俄國革命的偉人。

2000年1月12日

註：後來托洛茨基解釋：「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及他的遺囑還無人知曉。倘使我獨自行動，就會被說成是我個人要爭奪列寧在黨內和國家內的地位。一想到這，我就會不寒而慄，我認為這會在我們隊伍內引起相當大的混亂。即使是我們勝利了，我們也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我的生平》下冊，第53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下列書籍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 46 3429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Ongoing struggles on the 11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in China

Zhang Kai

Although it is 11 years since the Tiananmen Event in China, and despite the many repressions on dissidents, the struggle against authoritarian rule has continued.

Over 100 families of the people killed during the June 4 repression have launched a campaign named as The Tiananmen Mothers. In conjunction with groups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similar groups from Argentina, Chile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Kwangju Incident), they have joined in an action called End of Impurity in which they demand the governments to stop their acts of repression of the people. The families also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Jiang Zemin and Zhu Rongji, demand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June 4, explicat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and compensation to the deceased and wounded.

8 dissidents from Jilin Province and the well known dissident Liu Xiaobo have separately issued open letters to demand rehabilitation of June 4, release of detainees, compensation to the deceased, political reform, and instituting democracy.

In Sichuan, Henan and Hebei provinces, as well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dozens of democratic fighters went on a 24-hour hunger strike to commemorate the dead. On the day of June 4, at least 15 persons are known to have been arrested for their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two student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who lit a candle in a vigil.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which was under heavy surveillance, Shen Zhidao, a support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took a similar action as what he did last year. Last year, at the same spot, he was arrested carrying an umbrella with the word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ritten on it. This year, he wore a shirt with the words "Down with Authoritarian Rule",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written on it, and was again arrested.

In Hong Kong, 2,00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a protest march, and 45,00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June 4 candle-light night vigil. The theme this year was to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s on democracy. In Taipei, the biggest candle-light gathering since 1989 was held,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ies participating. Gatherings also took place in the US, Canada and Europe.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many cities in the States, such as Harvard, New York, Washington and San Francisco, more people turned up than last year.

Back in 1989,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as prompted by massive discontent from various sections of society about inequality, social injustice, corruption, graft, and growing hardship in life. The demand for political reform was reject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and clamped down by the army. However,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prompting the eruption of protest in 1989 aggravated after the crackdown. The privately accumulated wealth of big and small bureaucrats also increased. This show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1989.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impoverishment caused by the bureaucracy have prompted more and more protests and struggles. Here are some concrete data.

1. According to internal stat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in 1999, at least 100,000 cases of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 marches had taken place all over China. This meant an average of 270 cases everyday, a 70% increase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Lately, in Beijing and Shenyang, there were reports of the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 to protest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ir livelihood, and they usually blocked the traffic. (Apple Daily, June 12)

2. In 1999, labour disputes in China amounted to 120,000 cases, 14 times as many as that of 1992, and an increase of 29% compared to 1998. Collective labour disputes, including rallies and marches, were 6,567 cases in 1999, with 251,268 workers involved. This was nine times the figure of 1993. In Beij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1999, the number of labour disputes was two times the same period in 1998. Collective disputes was four times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in 1998.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00).

3. There were 216,750 labour strikes in 1998, with 3.5 million workers involved. Of these, 627 cases were direct assaults on party or state institutions, and 459 cases involved violent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police. (China Labour Bulletin, March-April 1999)

The increasing discontent and protests from workers are due to several reasons: failure of the enterprises to pay wages; bad welfare or working conditions such as safety or sanitation inadequacies; infringement of worker rights; unjust compensation after layoff or retirement; sale at low prices of state-owned factories whereby the leadership pocket much money but workers get little compensation; layoff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e to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or privatization; resentment against corruption, graft and autocracy of the cadres.

In February this year,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troops were deployed to crack down on over 20,000 miners who had occupied the street for three days, blocked the railroad, and burnt cars.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also took to action at a time near the June 4 anniversary. A student, Yao Qingfeng, was murdered about a fortnight before June 4 on her way back from one campus site back to the main campus in the night. Students wanted to hold an obituary ceremony for her, but this was refused by the authorities on the ground that this was "an ordinary criminal case that happened outside the campus". This ignited student anger, and invited denunciations from students about the authorities spending money on renovating offices but ignoring safety issues for students, hence they should also be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tudent's death. Two thousand students rallied and marched in protest in the campu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attempted to march outside the campus.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then compromised, and allowed students to hold an obituary gathering in the campus. Six thousand students participated, with students coming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Thereafter, on the night of June 4, there were big character and small character posters in the campus demanding rehabilitation of the June 4 Incident. Candles were also lighted.

15 June 2000



OCTOBER REVIEW VOL.27 ISSUE 3 2000.7.15

HONG KONG

- 2 3 Years of SAR Government Zhen Yan
4 Abolish the Language Standard Test! Wei Bo
6 In support of Leung Kwok Hung! 20 Groups

TAIWAN

- 7 Re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for the new President Jun Xing

CHINA

- 9 Ongoing struggles on the 11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in China Zhang Kai
11 Mothers of Tiananmen no longer sad (reprint) Ding ZiLin
12 Liao Lin workers' struggles (tr) Shi Dan
14 What are the worries of workers (reprint) Zhu Yuntao

INTERNATIONAL

- 15 Is this the 'Information Age'? B. Robinson
17 A net gain for Capitalism? A. Kilmister

- 19 Is the European Union becoming a world power? F. Vercammen
22 Organisational corruption in Japanese police (tr) Feng Kerui
24 Clinton to 'save' Social Security N. Weinstein
26 Pakistan: iron fist in a velvet glove M. Marquese
28 Iran: showdown in Tehran? S. Aahman
29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Kazakhstan I. Kurmanov
30 Putin first tsar of all the Russias? J. Malewski
31 Fifth conference on Trotsky M. Vogt-Downey
33 Finding Trotsky's birth place M. Vogt-Downey

BOOK REVIEW

- 34 After reading *Utopia Without Regimentation* Tian Yao
37 On reactions to *The Prophets* (2) Ma Weishi

ARTICLE IN ENGLISH

- 42 Ongoing struggles on the 11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in China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7卷 第3期 (總第201期)

2000年7月15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 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並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鯉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01

空郵：亞洲US\$18.01

其他US\$22.01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目錄

香港	2 成立三年來的香港特區政府 振言
	4 終身進修！撤銷語文基準試！ 微波
	6 支持民運人士梁國雄！ 公民抗命無罪！ 20團體121人聯署
台灣	7 陳水扁就職後的兩岸關係 軍行
中國	9 「六四」十一週年看中國社會的抗爭 張開
	11 天安門母親不再悲傷 (轉載) 丁子霖
	12 遼寧工人的抗爭 史丹譯
	14 職工憂什麼？ (轉載) 朱運濤
國際	15 這是「訊息時代」嗎？ 羅賓遜
	17 資本主義的純利潤是來自新經濟？ 基爾米斯特
	19 歐盟向世界霸權邁進 韋卡曼
	22 日本警界組織性腐敗現象一瞥 高島義一
	24 克林頓和國會要「挽救」社會保障 溫斯坦
	26 巴基斯坦絨手套內的鐵腕 馬奎斯
	28 德黑蘭的攤牌？ 阿斯曼
	29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內望 庫爾馬諾夫
	30 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第一時期的終結 馬列維斯基
	31 第五屆研究托洛茨基國際會議 霍道尼
	33 尋訪托洛茨基的出生地 霍道尼
讀後感	34 真理在前進中——《失去強制的烏托邦》一文讀後 田友
書評	37 《先知三部曲》評介(二) 馬騰雲
英譯	42 Ongoing struggles on the 11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in China .. Zhang Kai